

创新合作模式



社会治理的挑战与应对

——上海论坛 2015 会后政策建议书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复旦发展研究院

绪论

创新合作模式：社会治理的挑战与应对

在“十二五”规划顺利收官之年，中国的改革进程步入新时期。放眼全球，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合作中发掘机遇、解决矛盾；立足国内，面对网络时代的“新常态”，在探索中以创新提升治理能力、应对挑战。在这个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不断学习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更多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要建立完善社会治理的机制模式，依托网络化力量有效应对社会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挑战，要用创新性思维将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有机结合，为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打下坚实的基础。

建议一：以区域互信为基础，推动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

第一，从本地区入手，建立区域问题协调机制。亚洲问题极具特殊性与复杂性，在历史、文化、贫穷、平等、污染等问题上，都显著影响着亚洲地区的安全与合作。这中间既有区域外大国的身影不时出现，也交织着区域内各国历史问题的爱恨情仇。对于亚洲国家来说，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本地区互信。在最为棘手的领海争端中，应该适当加入多边机制，借助经济的纽带达成和更多国家之间的合作，

通过更多的战略对话与互动寻求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使矛盾升级。

第二，全面推进国际合作，以更高的站位应对国际事物。在不断推进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中国要着眼于建立全新的国际协作机制，利用多边合作、法规建设、资源管控、以及产业化的力量，在信息安全、跨境数据传输、气候合作、政经改革等各个领域树立标准。中国不但要发展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也要为国际合作的实践贡献力量，不但要鼓励中国的企业与官员“走出去”看一看，也要欢迎国外的同仁来中国，增进互相的了解，最终使中国达到领导构建全新国际规则的目的。

第三，拓展国际资源，发掘“一带一路”能量。作为维系中国全球合作战略的纽带，“一带一路”的战略目的不容小觑。中国既要认清“一带一路”沿途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包括重视极端主义势力和沟通协调上的困难，也要从官方到民间都做好充分合作的准备。“一带一路”既是经济、金融的交流，更是文化、宗教的传播。中国要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拓展国际资源，将“一带一路”的能量充分挖掘出来，一边搭建平台，一边整合资源，为中国和世界的经济与文化合作创造全新动力。

建议二：重视“互联网+”新潮流，转变社会治理思路

第一，创新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构建国家治理新局面。现如今全球正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经济水平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创新驱动变成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

国信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一现实之下，中国一是要加强法制建设，营造理性的讨论氛围，二是要创新互联网的治理新格局，动员社会力量共治共建，形成良好的共治氛围，三是要在观念上变以往的消极管制为积极管理，兑现构建一个开放互联网的承诺。只有真正发挥互联网作为现实世界的“解压阀”的作用，才能利用网络空间的优势创造新的治理模式，解决现实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难题。

第二，完善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法律机制，引领媒体转型。在新时代建立网络合作机制时，决策者不能感情用事，而要用智慧去治理，在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用持续性和标准化来制定规则。同时，转变治理思维，有机化治理复杂系统，把握“放”和“管”的尺度，转变媒体融合观念，探索成功的、可复制的模式，通过大数据及时把握受众需求，提供针对性的产品。提出以上论点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一定要站在全球角度看中国，一定要站在网络空间看中国。

第三，着眼于民生问题，助力全面治理规则的建立。在当下中国，食品安全、空气质量和人口老龄化都是挥之不去的担忧。一是要从系统的、宏观的层面完善制度和规则，形成一整套食品安全的体系，打造一个连通官方与企业的食品安全研发和监控的平台，进行全产业链的过程管理。二是要在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完善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扩大试点范围，有限监督管控。三是通过长期精算平衡、改善制度结构、实行统账分离，以及鼓励养老金推迟领取等措施，妥善解决养老问题。

（撰稿人：姚旭）

目 录

(上)

立足亚洲问题，创新中外合作-----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国际背景

● 国际合作

- 一、明确信息安全五大任务，推进多种合作方式
- 二、防范跨境数据流动风险 保护国家信息安全
- 三、完善国际气候协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
- 四、借鉴墨西哥经验，助力深化改革

● 亚洲合作

- 一、亚洲问题，亚洲解决
- 二、加强亚洲国家合作，促进区域稳定
- 三、坚持合作共赢，推动中国海权发展

● 一带一路

- 一、“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 二、宗教传播助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 三、加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
- 四、建设一带一路电子平台，实现一带一路互联

(下)

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中国社会治理诸领域的挑战与应对

● 助力“互联网+”新趋势

- 一、探寻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新方向
- 二、战略性引领传统媒体转型升级
- 三、完善在线平台机制，助力互联网企业国际化
- 四、站在网络空间看媒体，打造新型网络格局
- 五、开启食品安全云建设，探索互联网检测新业态

● 构建社会治理新模式

- 一、建立完善法律机制，促进网络安全治理
- 二、创新互联网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执政能力
- 三、抓住网络强国，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
- 四、从五个方面应对“互联网+”法律障碍
- 五、正视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构建互联网生态平衡
- 六、网络空间治理的发展建议

● 共创民生中国新常态

- 一、明确食品企业责任，保障企业食品安全
- 二、开启食品云建设，探索食品安全共治模式
- 三、建设碳排放贸易系统，承担节能减排责任
- 四、积极应对老龄化

(上)

立足亚洲问题，创新中外合作

-----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国际背景

-----国际合作

一、明确信息安全五大任务，推进多种合作方式

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的含义有所区别。网络安全比较基础，而信息安全则包括网络安全，另外还应加上社交媒体、宣传机制等。

(一) 信息安全五大任务

第一，构建框架使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冲突。当今的网络冲突形势紧迫，涉及东西方国家，波及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所以亟需推动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冲突。在这一方面面临很多挑战：一个是希望和平解决网络空间冲突；二是希望针对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一些修改，将网络元素融入其中，这个问题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三是网络冲突框架中网络攻击归因及数据客观化问题，网络攻击归因问题面临许多挑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挑战，还有来自法律层面的挑战，网络攻击归因时还要保证归因特性的客观性；四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问题。

第二，改善关键基础设施的信息安全。首先要提一下，莫斯科国立大学信息安全研究所为莫斯科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全国最佳典范保障信息安全。而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方面也面临着几个挑战：一是如何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国际、国家法规和标准；二是创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国际体系以及发展用于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安全信息系统的国际认证体系；三是关键信息设施如何做到国际数据共享以及计算机紧急响应小组如何建立信心的问题，具体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就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进行数据共享，如何让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就网络安全性方面的薄弱环节进行经验分享等。在此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所与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展开的双边合作项目。这个项目是网络关键基础设施方面的科学合作，如何保护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是该项目的主要内容。

第三，从法律和技术角度来看，确保网络的稳定性、可靠性以及安全性面临政治、法律、制度、经济方面的各种挑战，需要制定保障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还需要制定各种各样区域性或多边的法律文件来更好地保护网络的稳定性、可靠性以及安全性。在这一领域，我们研究所与 ICANN 有双边合作项目，主要关于全球互联网技术标准以及如何确保互联网基础架构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防御能力。该项目的一些成果会在 2015 年 6 月底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 ICANN 会议上发布。

第四，应对激进和暴力极端主义利用社交媒体干涉国家内政的挑战。现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社交媒体、社交网络还有社交工程干涉他国内政，导致群众对政府产生误解。我们研究所就这个问题已开展研究工作多年，我们想为全球出一个的战略解决方案，在建立一个全球对话机制。

第五，在国际信息安全系统建设过程中，注重国家的优先侧重点及商业项目。

（二）多种合作方式

我们研究所的合作项目分不同层面，可以分为双边、多边和全球

合作，也可以分为与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因为研究领域与网络相关，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非国家因素，PPP 合作模式也是一种方式。

双边合作方面，2013 年 6 月，美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信心建立这个全新领域展开合作。但是由于一些政策上的问题，此项目现已暂停。2015 年 5 月，中俄签署国际信息安全合作协定，此举将会促进两国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为我们研究所的全球性举措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多边合作方面，2009 年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就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但是现在有许多措施并未完全推进到全球层面。有许多专家做该领域研究，他们应给我们带来他们的想法。而我们的联合国工作小组也应该在 2015 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但是由于在关键问题上的对话比较艰难，主要是国际安全、信息通信方面的合作碰到阻碍。2015 年 1 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个上合组织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更新草案。各国都想在信息安全方面达成共识，问题在于政治方面的共识。

（三）IISRC 大会

我们研究所于 2010 年达成 IISRC 平台，现有 15 个国家、22 个组织参与。该平台为非政府机构建立对话机制，2011 年制定了十个研究重点，其中包括民间基础设施和机制、对于网络的定义、网络法规等。而现在的重点则是在国际法中加入网络空间冲突解决部分，尤其是信息安全方面。考虑到西方国家到德国比较便利，每年 4 月都会在德国举行 IISRC 大会。而每年 10 月左右会在其他国家举办，如 2011

年在中国，2015年将在韩国举办。

撰稿：Andrey Kulpin(莫斯科国立大学信息安全研究所国际中心)

编辑：邓梦佳

二、防范跨境数据流动风险 保护国家信息安全

(一) 网络数据安全背景

网络空间数据安全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它变得愈发重要。斯诺登事件所带来的信任危机使得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些政策和法律面临现实的挑战。这对于研究者和学术界提出了紧迫的需求。

通过统计全球一日网络使用情况，对全球相应节点进行统计，可以发现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同步度很高，与人类地理分布高度吻合，其运行也与人类生产生活的保持同步，可以说网络世界已经与现实世界高度融合。

而物理世界即现实世界的全面数据化致使向网络空间的全面迁移，并带来两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是网络空间实现智慧化，包括信息映射、对物理空间的控制以及对未来的预测；第二个改变更具现实意义的净化效应，随着技术的发展净化效应很有可能发生。

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已成为核心战略性资源，其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开放性**，网络空间数据资源的开发开放数年前已推动，包括美国推出的开发浪潮；**第二是竞争控制性**，全球围绕全球数据的竞争和空间结构已经开始不断深化，各国已经意识到全球数据资源是一种竞争性和高度战略性的资源，因此不断加快对本国以及他国的控制。

（二）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管辖问题

1、数据权属界别三要素

作为核心战略性资源，大数据的权属界别问题也愈发重要，它可能跟三要素有关：**第一是广义管辖**，如谷歌公司肯定是属于美国的广义管辖，这是核心元素；**第二是服务器**，同样以谷歌为例，谷歌公司在英国或其他国家均设有服务器，服务器本身的地理位置必然对管辖权有影响；**第三，数据反映对象自身的所属国别**，同样以谷歌为例，如果谷歌在英国的服务器上存储了印度公民的数据，则印度也可能有管辖权。

2、应对数据跨境流动的两大趋势

数据权属关系带来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数据的快速流动，另一个则是本地助流。关于这两个问题全球有两个较为明显的趋势，一个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和流动**，作为数据先驱国家和核心资源的主体美国更加强调自由和流动的重要性，包括一些经济发展组织更加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另一个是除了美国、印度、以色列、南非和新西兰，绝大部分国家都拥有的**数据跨境保护**。斯诺登事件之后，全世界都着手建立安全体系，如俄罗斯于2014年7月立法强制运营商将俄罗斯居民信息存储在国内，若跨境运营商要求对本国公民数据进行跨境传输，则需要本国公民的书面授权。有了法律依据，本地化的管理趋势也成为全球趋势常态。

3、数据本地化的影响

关于数据本地化影响，以中国为例，根据美国政治研究中心的研究，若全面实施数据本地化，中国将面临3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

中包括境外投资。为避免经济损失，政府可以对企业责任进行约束，而不是要求企业一定将数据存储在本地设施，在这个方面，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都在尝试。未来的互联网可能不是最初统一的互联网，本地助流可能成为常态。

（三）中国网络空间数据跨境保护政策建议

美国和欧盟在数据安全方面较为领先，棱镜门曝光前，美欧合作范围不断深化，包括安全港协议、美欧数据共享协议，其中一些冲突随着互联网全球化将面临很大变化。而棱镜门曝光期间，形式比较严峻，欧盟停止了与美国的数据共享协议和安全港协议。但是美欧之间的信任基础由来已久，棱镜门只是近一两年的事。美国发布大数据时，特别提及要保护美国公民以及价值观相府国家的居民信息，促进流动性等。

中国采取的大数据跨境流动和本地助流政策，从长期角度来说，是一种动态平衡，是有条件、有线路，甚至是吻合数据流动以及开发的政策。其中数据助流政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会起到一定作用，尤其在核心关键领域。

第一，围绕大国地位对本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进行管理、获取以及开发，进一步探索如何占领中长期管理和系统对话。

第二，大力推动数据安全技术创新研发和产业化发展。中国的许多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问题都是由于自身安全能力不足导致。中国的两极化发展随着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发展可能形成动态平衡和保护模式。一旦中国技术研发能力提升，政策制定上也可以更加开放。

第三，构建战略传播理论框架，积极参与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国际

进程。

第四，对中国 IT 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数据安全壁垒进行防范。随着华为、阿里巴巴等一批中国 IT 企业的崛起，这些企业必将成为中国数据资源的开发者和主要应用者。国家应组织相关力量就全球化过程中中国 IT 企业将面临的数据安全壁垒进行研究，为这些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第五，面向公众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国家信息安全的根本。传统认为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保障，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成为了国家信息安全的基础。大数据时代，如何塑造政府、企业、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分配机制成了重中之重。

撰稿：惠志斌（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信息安全研究中心）

编辑：邓梦佳

三、完善国际气候协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我们需要进行国际合作，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共有两个目标，一是防止危害性的人类活动影响气候系统，即减缓行为，二是使我们的生态体系能够自然地应对气候变化。

（一）气候变化谈判开展情况

气候变化应对工作的展开需要激励所有人参与其中，而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能力，因此需要确保公平以及相互之间的信任，即求同存异的责任和相同的能力认可(CBDR 和 RC)

有关联合国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可分为三个阶段

(1) 令人激动的开始阶段。在气候谈判一开始存在着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因为按照框架公约来讲，在 90 年代的时候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但同时很多参与国当时感到压力重重，在气候框架公约出来之后，1997 年进度议程书达成。

(2) 人抑郁的错则阶段。针对上述的进度议程书，美国的态度不是很清楚，在 2001 年，美国拒绝参与协定，同时在哥本哈根达成的协议没有任何法定地位，所以在这个阶段基本处于参与国相互指责推诿阶段。

(3) 气候变化条约转型期。2011 年开始出现一个探讨该问题的平台，主要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整个气候巴黎协议将会为整个世界拟定一个总体的目标，而参与者则各自尽自己的努力，这也就是气候变化条约或者是制度的转型期。

(二) 有关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国际合作的建议

第一，发达国家的引导作用。针对气候变化应对工作的两大原则之一即减排原则，发达国家须在其中发挥引导作用，在当前阶段，发展中国家仅仅有支持义务，其还没有能力做到减排工作。而如果对发达国家有一个量化减排的目标，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要求的话，就再一次加强了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非对称性关系。在从 2010 年开始的阶段中，发展中国家也是议定书的参与者之一，所以他们一样需要做到一个量化目标，但相比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制定一个相对较和缓的目标。针对各方对谈判所做出的贡献，将会有有一个图谱，在这个图谱上，会显示每一个国家的贡献率。

对于发达国家的引导作用主要有以下原因：

(1) 尽管在二氧化碳及类似温室气体的排放上，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其中占比最大，但是发达国家（如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在其经济转型阶段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占了最大的比例。

(2) 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现在已经贡献了全球整体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总量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减排上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第二，针对各个国家需求制定预案及适应措施。在过去的 20 年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项目，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已经做了自己的一个预期自助，但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会提供他们国内的行为，而会适应国内的工作来公布信息。对于他们的需求都尚未清晰。巴黎气候协议的一些要点中，第一个就是减轻人类活动因素，每个国家都要在自己制定的贡献预案中提出自己的贡献，并基于自己的能力，提出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仅根据这些预案还不能很好地解决减排的目标。所以需要对这些 INDC 预案做一个审查，来看它与实际需求的差异。并且这些参与国都要在 INDC 预案当中说明与预案相关的适应措施，而在具体实施中，我们需要一些国际性的，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第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工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来了解如何让其他国家提供支持，来帮助自己拟定行动方案以及策略，否则的话，在没有任何帮助与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将会遇到诸多困难。同时还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的激励方案，并有一个相关的策略来使得支持获得方更好地利用他们所获得的这些支持。这些支持对于建设能力、相互关系、透明度等都非常重要。对于透明度方面，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体系，比如 MRV

会计准则等。当前也有一个国际层面认可的统一规则以确保各国的报告有一个一致性。

第四，相关法规建设。法规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信号作用，尤其是对于自下而上的模式而言，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会按照法律信号的强度来进行反应，因此需要一个较强的系统对各国义务进行约束

撰稿：**高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编辑：沈轶敏

四、借鉴墨西哥经验，助力深化改革

(一) 墨西哥与中国的相似之处

第一，墨西哥在 20 世纪后期也是由一党执政、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持续了几乎 70 年。

第二，20 世纪 80 年代墨西哥国营企业同样规模庞大，并经历了之后的私营化改革。当时墨西哥国营企业总数大概有 100 多个，接受政府的大量补助，并在电信、银行、能源等领域形成垄断市场。其总生产量大概占 GDP 的 13%。到了 80 年代初期，由于整个墨西哥经济衰退，世界石油价格下滑，墨西哥政府遭受了许多债务危机，这使得墨西哥政府决定开始私营化。最近的研究发现墨西哥国企私营化是部分成功的，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国企仍缺少活力，以及一些社会问题：员工失业问题、私营化过程的透明性等。

(二) 墨西哥私营化转型的原因

第一，战后墨西哥引用的所谓出口缺乏竞争力，出口总额只占整个 GDP 的 10%，且 80 年代出口产业都是以石油为主。

第二，能够支持国内的产业大部分都是没有竞争力的国营企业，政府因此放出很多的贷款，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油价大幅度的下滑更使政府赤字累累。

因此贸易缺乏竞争性就无法立足世界。而竞争力的提升需要资本，政府缺乏长期的资本支持，就不得不找私营化的公司支持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中国潜在的问题

在表面来看，中国今天的情形可能并不相同，中国目前是以出口主导的经济体制，出口产业良好，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仍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现在中国表面赤字不多，但未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债务危机。部分地方政府 GDP 的 40% 都是赤字或坏账，一些私营的公司的赤字甚至达到了 GDP 的 125%。若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经济下滑甚至利息转向自由化，债务危机就可能恶化。

第二，出口产业竞争性下滑的可能性。中国出口量占 GDP 的 30%，为经济起到很大贡献，但其中大量产业主要由廉价的劳工生产制造，伴随着中国有农村转向城市的劳动力逐渐减少，中国出口的竞争性就可能大幅的下滑。

第三，起主导作用的国营企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这反映出国营企业并没有了解市场真正的需求，对市场不够敏感。

（四）墨西哥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第一，私有企业的重要性。在中国存在很多有创意且效率高的私营企业，比如说阿里巴巴、小米手机及一些小企业。而国有企业则很大程度扭曲了投资方向，而且不能够维持长期的发展。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那就很可能会鼓励更多私有企业，这可能是十分值得中国关注的事项。

第二，政府需控制得当。墨西哥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石油价格的下滑，经济出现了诸多问题。在墨西哥的体制下，可较快地利用私有化方式解决，而在中国一个政党集权管理的制度下，私有化的推动就将会面临巨大挑战。墨西哥当时也面临了相似的一些问题。随着私有化不断推进，政党逐渐失去它的控制能力，造成了政府的一些风险，从而遭遇了不同政党的反对。但私有化经济的改革的确减少了政府独裁的权力，甚至部分解决了腐败的问题。这其中就需要政府控制得当。

由于私有化改革往往影响到整个政府，因而许多政府除非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并不会主动进行私有化。但在危机状况下，私有化又可能成为唯一解决方案。今天中国的政府，还是由国有企业主导，政府资产的 30%都是属于国营企业。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但是墨西哥过去三十年的经验可能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借鉴。

撰稿：**Jorge Guajardo**（墨西哥前驻华大使）

编辑：沈轶敏

-----亚洲合作

一、亚洲问题，亚洲解决

(一) 亚洲问题自行解决的关键点

亚洲如何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对亚洲各国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在该话题的探讨上，我们必须从亚洲的视角去解决亚洲面临的问题，而亚洲问题自行解决的关键在于：

1、亚洲有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是否可以自行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以及安全隐患之外的许多其他问题。

2、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我们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安全挑战？

3、对于目前这些问题来说，我们能否找到可行的方案？

4、解决这些挑战意味着什么？

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如果我们不接受亚洲之外国家的帮助，还能否自行地渡过这些难关。冷战之后，美国在不断地影响着亚洲的发展，没有美国的干预，亚洲是否可以自行解决这些安全问题？

(二) 亚洲问题自行解决的现实背景

1、**美国干预亚洲问题的不单纯动机：**美国来到亚洲并不是这么单纯的想帮助亚洲解决安全问题。中国、朝鲜、韩国、巴基斯坦以及中国台湾的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争端，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冲突，包括中国的南海也是如此。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一直参与其中，然而美国的持续干预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很难说美国究竟是不是想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亚洲的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亚洲国家要百分之百地自行解决，但是我们更不能完全地依赖美国这样的国家的

外部援助。

2、亚洲总体平稳的安全环境：就亚洲来说，有关岛屿的争端可能是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前面我们提到了亚洲很多问题，然而不管是岛屿的争端，还是其他的争端，都并不会造成国家之间的战争，对亚洲国家来说，整体局势还是比较平稳的。亚洲最大的问题仍是贫困，另外就是教育水平不够高，这些对于亚洲国家来说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3、亚洲问题的复杂性：亚洲各国不论面积的大小，都有着一些共同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对亚洲各国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但所有问题的影响因素都非常复杂，综合起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可以作为万能钥匙的解决方案。亚洲所面临问题的主要因素具体如下：

(1) 贫穷问题：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也是最重要的大陆，三分之一的亚洲人口都是比较贫困的。中国的总理也提到过，有 2 亿中国人口依旧在贫困线以下生存。我来自印度，印度贫困人口的总数超过了北美和拉美全部人口之和，另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就是贫困人口的不不断增加，而且其中 70% 的人口接受教育的水平都非常之低。

(2) 文化问题：我们要看到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化多样性，不管是使用的语言，还是种族、文化都是如此。亚洲很多国家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包括印度和中国。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时候可能会成为亚洲主要问题的来源，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跨越国境线，造成全亚的问题。

(3) 不平等问题：主要包括地域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中国的国土面积（960 万平方公里）非常大，印度的国土面积也不小，但是比起中国却相对小很多。亚洲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在国家规模、人口总

数以及自身文化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亚洲各国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亚洲不安全的根源。比如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国家，也是最大的经济强国，这就会引起邻国的恐慌，从而构成其他的安全隐患。一些小的国家希望从外部获得一些资源来解决这种恐慌。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种不平等所带来的问题。例如在中国南海及其他不同海域的争端，这些层出不穷的有关水域的争端都来自于相对弱势的国家的担忧，当然也来自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印度和中国之间也存在着历史遗留的问题，伊朗等国也有这种问题，这些都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4) 其他问题：例如污染的问题，也是无国界的，需要亚洲各国通过更好的合作来解决。另外传统的一些观点认为，在亚洲，中国迅速的发展以及很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都会造成争端的加剧。同时，尽管整体的经济增长加快，但贫困依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亚洲还有很多内部问题，我们都必须要加以重视。

(三) 亚洲问题的现状

1、每一种新的问题，都必须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而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引发一个全新的问题。例如经济增加当然是好的现象，中国富裕人口很多，中产阶级也很庞大，但同时贫富差距也很严重，在印度该情况则更甚。又例如科技的发展非常关键，但是新技术的发展也会造成新的负担，比如会带来更多的失业。这些问题都是实际存在且有待解决的，各国均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那么需要考虑的是，在一国内部是否可以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2、合作与自主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亚洲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多

种多样的，如贫困问题和多边问题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和亚洲之外的国家进行合作，仅仅依靠亚洲各国无法找到很好的答案。而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亚洲各国之间更好的沟通来解决。以上两种途径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亚洲的安全隐患。

在我看来，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参与领土争端问题的局面，其实也是大国在亚洲实力的体现。同时中印两国之间较为复杂的关系，以及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都会影响周边国家的关系，且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总而言之，亚洲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其中一些问题需要通过亚洲内部协商解决。

撰 稿：Chintamani

Mahapatra（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加拿大、美国与拉美研究中心）

编辑：沈轶敏、焦露曦

二、加强亚洲国家合作，促进区域稳定

在讨论亚洲面临的急需解决的安全问题时，必须首先评估亚洲国家解决安全挑战方面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解决能力。目前，亚洲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趋同，一方面则呈现出多元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无论是投资方面还是工业发展方面都存在这两种趋势。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本地区的互信。目前，美国通过遏制中国和支持美在亚洲的盟国，有加强介入亚洲事务的趋势。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竞争，部分国家可以起到相对主导的作

用，不同国家的军队力量也在发生变化，在一些主要国家之间还存在冲突。在东北亚，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争议。其实，两国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钓鱼岛，还涉及历史问题和资源影响力。另外，朝鲜半岛问题也非常严峻。东南亚也出现了众多岛屿的主权冲突，亚洲国家正面临着不信任问题。2013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主要是通过双边机制来解决问题。同时，多边机制和国际仲裁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随着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快速发展，亚洲安全系统也在不断发展。在亚洲区域还有其他领域的开发，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面就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目前已经有五十多个国家响应；日本也准备投资数十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同时也是中国对整个国际局势做出的安全性的回应，可以改变目前的格局。

中国要借助经济的纽带达成和更多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中巴经济走廊已经使中巴两国得到了很多益处。中国与印度也进行了很多的对话。莫迪在最近对中国的访问中就双方的安全政策进行了磋商，这些都会促进很多问题的后续解决，并催生新的解决方案。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必须首先促进相互之间理解。

虽然面临很多军事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是随着亚洲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亚洲应对安全隐患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这将使亚洲能够将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巴基斯坦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巴基斯坦认为两国的合作是非常有益的发展。中国将会作为亚洲稳定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各国的经济纽带，建立更好的关系。

东亚和中东等地区的冲突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直接影响？美国的介入又会如何影响亚洲？未来亚洲的命运是掌握在亚洲各国手中

的，我们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以此对亚洲地区的稳定做出贡献。亚洲存在的贫穷、教育程度低、法律体系不完善、区域不稳定等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

最后，对于亚洲安全机制的建设必须更具代表性，关注的方面要更广。不仅仅要关注亚洲，还要关注其他地区的发展。

撰稿：Masood Khan(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

编辑：盛中蕙、焦露曦

三、坚持合作共赢，推动中国海权发展

(一) 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本动力，促动中国从传统的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

1、工业资本和金融体系支撑了近代化海权国家的发展。海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近代化的产物。近代以来的世界主导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海洋国家，从荷兰到英国到美国，为什么东方的许多国家没有走上海权的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东方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大陆国家，传统的农业文明缺乏一个海权发展的动力。尽管历史上也出现过郑和下西洋的奇迹，但不是在商业的动力驱动下来完成的。近代以来的海权的兴起和发展，是依靠资本不断更新、不断提高而推进的。早期的像葡萄牙和西班牙，这种海权基本上是商业加海盗的这样一种较低级的模式，进入到荷兰，实际上他成为一种商业资本支撑的海权。到了英国和美国，实际上是工业资本加金融资本支撑的

海。

2、亚投行、“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要建立一个综合性海洋强国的发展方向。反观中国，长期以来海权的发展，为什么缺乏一个根本的动力？就在于缺乏资本的这种驱动。近代的中国，也曾经试图建立海军，但是海军和商业经济和资本拓展，完全是脱离的，因此 1895 年甲午海战，号称亚洲第一的中国海军很快就灭亡，与此同时，世界性的主导型的海权国家，往往也是技术创新，科技创新能力比较领先的这样一些国家，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逻辑来看，当前的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建立，尤其是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贸易依存度的层强，海外投资的增强，很大程度上都是驱动中国海权发展的一个动力。有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贸易、海外投资和海外利益，进而促动中国从传统的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如果拿当前的中国的发展来看，比如说中国对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调整，对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视，工业化进程的这种加快，对海洋管理体制的调整，深海技术以及极地科考能力的增强，包括像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些都反映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由于中国发展模式、跟世界联系方式，尤其是背后巨大的资本动力的驱动，反映了中国要建立一个综合性海洋强国的这样一种发展方向。

（二）中国在向海权发展过程中，面临地缘政治制约。

1、海陆复合型国家，对国家领导者提出更高的战略指挥的要求。中国作为海陆兼备的一个国家，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他们主要属性也是大陆属性，也曾追求海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失败的教训可供中国汲取。对于海陆兼备的国

家发展海权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海洋性国家。为什么？主要是在很大程度上，陆海兼备的国家往往面临选择方向上的关系，也就是向陆地方向发展，还是向海洋方向发展，容易导致战略资源分散化，即要往不同的方向投放国家的资源。因此海陆复合型国家，就对国家领导者提出更高的战略指挥的要求。

2、“一带一路”是把海洋方向和陆地方向二者统筹起来发展的战略思维。对中国而言，冷战时期中国主要的安全压力是来自陆地方向，冷战后有所缓解，但是这种压力仍然没有排除。近年来中国海洋方向的安全压力在不断的增强，而且中国仍然有潜在的同时面临来自海上和路上安全压力的风险。我认为可以从陆海平衡的角度，来解读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统筹陆海两个发展方向。陆地方向，实际上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方向就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印孟缅走廊，恰恰是把路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这个反映了目前的中国尤其是新一届的领导集体，力图把海洋方向和陆地两个方向统筹起来发展的战略思维，当然这背后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安全压力。

（三）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坚持合作共赢。

1、建立中美战略对话和战略互动，处理中国在海权发展中与美国的关系。最近大家也看到了，中美在南海的焦灼态势。在历史上，作为大陆性陆海兼备的国家，在向海洋方向发展的时候，往往会遭遇到既有的海洋霸权阻挡困境。一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作为一个海陆兼备国家挑战英国的海洋霸权，有很大的关系。当今国际社

会把今天的中美关系，比作历史上的英国跟德国的关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怎么汲取历史上德国挑战英国海洋霸权，导致世界性冲突的教训，自然成了摆在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任务，即能不能走出这一个陷阱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建立不冲突、不对抗、坚持合作共赢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决心，但是这背后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问题，这需要中美的战略对话和战略互动来解决。

2、缓解矛盾和冲突，走出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冲突的历史困境。从中国方面来看，我认为不宜不断的夸大中美之间的海权的这种张力，从美国方面来说，也应该理解中国为了实现自己的主权利益和海洋权益所在海权方向上的发展。美国应该看到中国发展海权，更多的是为了维护主权权益和海洋权益，而不是要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也不想破坏亚太地区的海洋通行安全，更不想把美国从亚太地区赶出去的这样一种愿望，也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和意志。因此当前中美建立了许多机制，要缓解这些矛盾和冲突，但是这毕竟是摆在中美面前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不仅需要新兴大国做出战略的调整，更需要守成大国来改变战略思维，只有双方都改变这个战略思维，才能走出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冲突的历史困境，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任务，同时也是美国的任务。

撰稿：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编辑：姜华夏

—————带一路

一、“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一) 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

1、地区局势的复杂性

在亚洲地区，尽管大国之间没有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对抗，但是在亚洲，不管从文化、宗教，体制，历史发展和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方面，都是呈现出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姿态。尤其一些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小国家，内部都有高度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在这里面，如何通过国家与国家的合作，克服不稳定因素，确保“丝绸之路”的发展？这是第一个大的挑战。

2、极端主义势力

所谓的三股势力，尤其是现在极端主义势力的挑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挑战主要来自于两个发源地：一个发源地是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一地区，另一个就是今天中东地区。这两个地方的挑战，都是极端主义势力的反人类，或者是反现代文明的冲突。这个冲突，有非常深刻的宗教、政治和社会资源。关键在于要克服这些挑战的各个大国，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背景不一样。因此对付这些极端主义势力采取的战略、战术和具体政策也不一样，如何把这些整合起来？这是第二个大的挑战。

3、沟通的挑战

普京总统最近提出的“欧亚联合体”战略是很好的想法，但是没

有很好的政策。在这个时候，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两个战略，有相像的地方，是可以一起并肩而行的。普京总统提出来的“欧亚联合体”有政治导向，但缺乏具体的政策。中国的“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它的目标是通过发展促进合作安全，通过经济的发展，创造共同的利益。显然这两个战略前者是政治主导的，后者是经济主导的，这两个发展战略是有差别的。如何把这两个大国在该地区的发展战略整合起来，使其能够彼此互相呼应，互相协调？这是第三个大的挑战。

（二）从面临的挑战看应对与合作的方式

1、官方的合作方式。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通过对话、交流协议等方面进行合作。官方在欧亚大陆上，有一个非常好合作的前景——上合组织。

众所周知，以美国为主的战略项目建立的时间都是在冷战期间，其建立的目的是要针对敌人的。所以它的根本目的是搞对抗的，不是搞合作的，因此在本质上是排它的，不是包容的，不允许其他人加入进来。而上合组织一开始就是为了合作而建立的，因此他在本质上是包容的，是开放性的，他并不是搞对抗的。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

在“丝绸之路”的安全合作上，要秉持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开放；第二个是以合作为目标，不是搞对抗的；第三个原则是包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真正地进行安全机制的合作。这里我有一个想法：因为各国之间的利益不同，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先决定什么不做，再去决定要做什么？比如说一些原则：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不引进域外的大国势力解决本地的冲突……先将这些原则制定下来，如果出现了问题，

也可以把范围控制住。现在决定什么不做的问题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管控现在已有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探讨如何去做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政治，经济发展，文化交流。

2、“二轨”和民间的合作方式。通过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冷战以来，大国与大国之间，各地区发展的很好是“二轨合作机制”。“二轨合作机制”说白了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在交流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说话不负责任的机制。双方都可以摸清对方的底线，可以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通过和那些对政治制定有影响力，能够进行政策建议的智库和研究单位的合作，来对比较敏感的，但是又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进行交流与磋商，为各自的政府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

还有一个合作方式就是经济上的合作。经济的合作方式，一定要以市场经济为推动力，要以尊重合同讲信用为基本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欧亚大陆“丝绸之路”发展经济合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投资量特别大。**因为都是基础建设的投资，不是几亿可以搞定的，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第二个特点是投资周期特别长。**不管是能源投资也好，基础建设也好，管线投资也好，道路设施投资也好，投资都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的，不是很快就可以把投资效益收回来的；**第三个特点是政治风险非常大。**一些国家由于政治不稳定，所以使得投资风险特别大。这就决定了经济上的三个发展方向，或者说是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不能以政府的政治意愿为主导；第二个原则，要充分的尊重合同法律，形成一种按经济办事的信用度，这个信用的建立，不是建立在我和你在战略上有没有互信，而是在参与的各方面，对形成的合同一种尊重；**

第三个原则，要尊重的一定是多方的合作机制，不能是单方面的。一定要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充分培育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样才有更大的发展余地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3、大国主导的合作方向需克服两大问题。第一要克服的是在欧洲部分。逆向而行。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对抗局面。在这方面中国是可以起到作用。第二在亚洲部分。大国之间尽管相向而行，由于政治制度，发展水平文化渊源的不同，产生的误解和误判。在大国主导的大趋势建立以后，地区的一些其他的问题，三股势力也好，经济发展滞后也好，缺乏信用也好，缺乏市场经济动力也好，都可以通官方和民间的两种合作方式来逐渐的加以克服和解决。

撰稿：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

编辑：张路

二、宗教传播助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一）“一路一带”中的文化交流与宗教问题

近年来提出的“一路一带”战略是我国“新常态”能否维持今后10年或15年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关键。“一路一带”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设想，更要求文化上的联系。具体包括：广泛开展媒体合作、学术交流、志愿者服务等；扩大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以及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一万个政府奖学金金额；加强旅游合作，促进文化教育。

“一路一带”主要涉及两部分的交流地区：政治腐败的高风险地区，以及政治动荡、能力弱的第三国家地区。

“一路一带”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伊斯兰教。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一路一带”主要涉及伊斯兰国家，而这道围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一路一带”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是第三次，第一次在汉朝，张骞从西域带来佛教，从唐宋开始佛教就本地化了；第二次在唐朝，西方开放，商业交流增多，“一路一带”逐渐形成，伊斯兰教由此传入。当时中国还没有伊斯兰教和佛教，本地的宗教势力非常强大。

(二)国家和商人在宗教传播中的作用

在全球化下，国家和商人在宗教传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行动中最有发言权，一个有权力，一个有财富，所以他们的传播能力特别强。他们的行动有些是以宗教为目的，有些则不是。

(一) 国家作用。举个例子，杭州刚竣工的清真寺可以容纳 2 万人，吸引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来杭州投资。显然，在宋朝并没有如此大的规模。另外，宁夏为了吸引穆斯林投资推广阿拉伯语，在宁夏随处可见阿拉伯语的标识。

中央能够提供合法性，政府的宗教措施改变了原有的宗教生态。浙江的伊斯兰教发展很大程度是和国家层次有关系的；温州地区有很多台商在自己的厂商中建教堂，在美国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宁夏为推广伊斯兰教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造成了宁夏伊斯兰教的变化。老教正在衰弱，宗教生态已经发生了改变。

(二) 商人作用。商人经商推动商业的发展，然而，有些商人的目的和经商无关，而是在经商的大环境下进行传教。比如，义乌的伊

伊斯兰教最近发展很快，教徒非常多，也有家庭聚会，并且伊斯兰教教徒增加的趋势仍在持续。浙商在宁夏投资的重要景点也大规模推动了伊斯兰教文化。

就“一带一路”问题来看，实际上就是国家强大之后不可避免需要与外界交流，这也要求需要有一大批学者懂外国问题。

撰稿：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编辑：盛中蕙

三、加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

(一) 合作背景

1、全球资金弥补美国赤字

为更好了解整个丝绸之路战略，首先应关注一下国际资本流动方面的研究。从金融角度来看，过去三十多年中大部分国际存款都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美国，美国财政赤字以及负债也随之增加。而美国长期债券多为外国持有。

1994 年美国长期国库债券的外国持有规模为 1.2 万亿美元，而 2014 年时该数字增涨为 15.5 万亿，是 1994 年的十几倍。而这些外国持有者，尤其是利益相关的持有人，则以中国和日本为首。外国政府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大概在 50 亿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和日本所持有，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在过去三十多年提供了大量资金来弥补美国财政赤字。这对实际投资也有深远影响。

2、美国控制生产性投资

在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的同时，美国投资者则在国外投资。然而与美国国债情况不同的是，美国投资者控制着本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投资者控制着超过 85% 的上市公司股份，而海外投资者影响甚微，中国和日本都只拥有美国股票市场 0.8% 的上市公司股份。

3、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

区别于海外投资者主要将资金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投资者的海外投资更多通过直接投资或股票。而其现实意义则是美国公司相比其他国家公司更容易获得股权投资，也就是说美国公司相比于国外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资本或资金。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比较难获得，将美国和欧洲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美国投资者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美国本土市场投资。对于中小企业或新创公司来说，美国的创投也是高于欧洲的。

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市场增长迅猛，虽然中国股市存在泡沫，但其增速仍十分可观。而创投方面，2014 年中国创投规模已经超过欧洲。中国在其他领域市场的增速也十分快，意味着中国现在有足够的资金支撑本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主要问题是资金短缺，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欧洲。

全球化过程中，尽管中国近年来上升势头迅猛，但美国金融行业在资金方面仍处于主导地位。区别在于美国金融行业全球化程度更高，对于全球标准和行为仍有影响力。就英国和美国而言，他们在金融领域做了许多研究工作，所以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做更多金融方面的教育和培训。美国整体地位过于强势，国际贸易中应尝试采取货币多元化取代仅用美元结算的现状，从而摆脱美元的影响。

（二）重塑全球资本流动格局

1、金融领域的“一带一路”

现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其他经济体也开始意识到需要控制自己的金融资源配置。所以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资本流动，有越来越多的新基金出现，其中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实，这些基金也会对美国的金融主导地位构成挑战。

2、“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从融资规模来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启动资金为 500 亿美元，日后会逐渐增加至 1000 亿美元。亚投行的初始认缴目标为 500 亿美元，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丝路基金的基金资本为 400 亿美元。可以肯定这些基金的规模都很大，对于金融市场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这些规模还不够。以欧洲为例，欧洲未来六年的基础设施预算达到 1.5 万亿至 2 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基础建设项目所需资金更多，这样看来这三个基金的规模还远远不够。如果这些项目想覆盖亚洲其他国家或非洲，投资量需要上好几个等级。作为参考，这三个基金的总规模大致相当于 2014 年外国在中国进行的直接投资总额（1280 亿美元），也相当于同年中国四大银行的利润（1380 亿美元）。所以丝路基金、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建立还不足以为所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关于资金运用方面，那三个基金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铁路、港口、道路等运输以及通讯方面的基础建设。但在这些科技高速发展的地区，不应仅限于基础建设，还应投资于高科技上，因为

新科技的发展不仅对于新经济体，对于各类经济体都有帮助，所以应为新型创新领域提供更多资金。

关于地域方面，亚投行主要关注亚洲和亚欧走廊的项目，这对于中国企业很有帮之，但并未让更多欧洲经济体加入其中，所以很难在亚欧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金融连接。在美国努力劝退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背景下，很多重要欧洲国家仍积极加入，此举说明欧洲国家对于建立亚欧经济连接的需求与愿望。

总结一下，要发展金融合作，应在国际层面发展多边、多类型、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并应在覆盖更大的地域范围。在新丝绸之路合作中，应让俄罗斯以及欧洲同亚洲国家一起参与，才能建立起亚欧合作机制，同时也希望更多多家加入，建立更综合、更广泛的参与机制。

撰稿: Jean-Louis Truel(法国 cercle Kondratieff 副总裁)

编辑: 邓梦佳

四、建设一带一路电子平台，实现一带一路互联

大家好，我叫宣承慧，从韩国来。我非常容幸能够参与此次圆桌讨论，我的讲演题目是如何来实现这种互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的互联。我会从艺术和文化的角度来谈，希望能够让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所说的合作与对抗这个话题。在我们的新思路中会谈到亚洲地区的文化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我想要向大家建议建立一个丝绸之路文化的电子文化带来进行亚洲地区的超级连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进行一个多

维度的一种促进教育和旅游业的互联，来促进亚洲地区的文化繁荣和文化发展。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中国人会用百度，韩国用 Lebo，东南亚地区使用谷歌，现在我试图在中国使用谷歌搜索，我可以使用我的手机进行谷歌搜索，但是我却不能通过手提电脑进行谷歌搜索。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这个平台之间，虚拟世界之间的一种国土领域差异部分。

我要提出一些问题就是互联网领域中间的国土性或者民族性，我们看到在这个领域也就是虚拟世界中的一些力量的角逐，今年我参加了达沃斯论坛，他们使用了推特这样一个沟通手段，我知道很多使用手机的人在我这个讲演过程当中，都能够用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信息的互通，达沃斯论坛就可以查到谁使用了推特在哪里发出他们的信息。我想指出的就是：**没有一个我们所说到一路一带的互联网平台**，我今天想要倡议我们一带一路电子平台的建立。

我的建议如下，我们要建立一个丝绸之路文化的电子文化带来促进我们的文化交流，并且在我们的政策制定中更好地促进亚洲地区的文化遗产地图绘制以及旅游业和教育业的发展，而且要和数据库连接起来。他们也能为基于我们附属网络的数字记述来提供一个商业资源库。

我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一号画廊”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带一路，而这个画廊它的口号是“一个画廊，一个主题”。它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文化项目，其中有大概 4000 个永久展品，大多数具有影响力的展品我们都能够在画廊中看到，同时他们也把这些艺术品进行了分类和汇总，一共有着 32 个藏品系列，这些画廊访问者也能够通过现有的工具下载，使用他们的工具，他们可以带自己

的 iPad 进入画廊进行一种对话。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通过合作和各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丰富我们的展览者参观者的一些体验，在这里我想要建议的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数字平台来分享我们新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信息。

现在我要说回我们的主题“一带一路”，目前我们面临的是哪些问题？作为一个韩国人来讲，目前我们政府在亚洲地区经济和外交政策是有重叠的，因此我们需要看到很多合作性的项目，他们要进一步按照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展开，而中国新的丝绸之路愿景并没有包括韩国和日本，韩国提出来的一个东北亚和平和合作倡议与中国的新丝路计划是有所重叠的，而日本的东盟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跟中国有竞争关系的。我们看到一些合作性项目的展开将会帮助我们减少在亚洲地区重复投资竞争方面的进一步加剧。

作为第一步来讲，在亚洲地区的文化、外交需要能够能够主动组织建立一种丝绸文化、电子文化带的一个委员会，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像谷歌艺术项目一样的，通过把地图绘制和文本信息以及图画信息结合起来更多地传递数据。我们这样地一个电子文化带，它能够带来视觉来自文本信息，就是文化遗产、绘图、地图绘制的视觉和文本信息的分享，它是属于一个互联网之上跨领域跨学科的工作模式。同时它也包括了很多亚洲地区旅游业相关的一些历史遗产地区乃至文化信息，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教育下一代更好地开展这种网络上的公开课程，来鼓励我们的艺术家更好地实现这种视觉数据的一个转型，并且通过这个电子平台来创建一个新的一种形象。我们都知道谷歌这么一个学院的项目，他们是希望建立一个平台来进行文化遗产和历史信息分享，很多地组织他们都加入到了这个项目之中去，并且上载

了项目信息，就像这个我想倡议建立一个类似于谷歌的项目，在我们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展开之中。

我的总结如下，我们项目的三大愿景和目标，第一个就是我们文化、地图绘制视觉信息的呈递，另外一个就是旅游业的促进，第三个就是帮助我们下一代的艺术家使用我们的电子平台转化它的视觉数据，创建新的形象。我们平台也支持公共使用和商业使用，支持参与的这些艺术家以创新的形式来分享他们的创意，同时我还谈到它是与 FTA 和 TPP 相关，我们知道版权很重要，这个项目之中亚洲的国家他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一电子平台超越国界进行超级互联，来分享本地乃至国际的信息在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中，同时它也给我们打开了地区一个新的文化纪元。

撰稿：宣承慧（韩国首尔市立美术馆学艺研究部）

编辑：杨徐健

(下)

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

-----中国社会治理诸领域的挑战与应对

-----助力“互联网+”新趋势

一、探寻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新方向

(一) 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概况

今年的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概况报告覆盖了五个大洲一百二十六个国家。调查的结果显示，2015年全球社会经济指数是0.5494。中国是在一百二十九个国家当中排在第八十八位，虽然整体还没有进入信息社会的第一阶段，但已经有五十一个国家超过了，过去我们常说的发达国家基本都已经超过了。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卢森堡、芬兰、新加坡、瑞典、瑞士、丹麦、挪威、英国、奥地利和日本。最高的卢森堡达到了0.8989，只差一点点就可以到信息社会的高级阶段，如果不发生大的变化明年应该就可以达到了。

根据这些测评，我们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

1、全球正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全球社会经济指数是0.5494，从国家的结构来看，处在信息社会开始的起步阶段有十三个国家，占到10.3%；处在加速转型的是最多的，占到49.2%；处在信息社会初级阶段的有三十四个国家；处在中级阶段的有十七个国家，目前还没有进入高级阶段。

2、经济水平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信息技术的整个扩散，包括整个社会关系和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不断成熟，

实际上在经济当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样的结论应该是出乎人意料。但很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信息社会发展的指数曲线。五千美元以下的指数，经济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说明了什么？这个阶段的作用非常之大，但是一旦过了一万美元以后经济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影响就会逐渐减小，那个时候经济发展就不是最主要的追求目标，更多的应该看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和谐社会更为重要一些。

3、创新驱动成为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分析了一下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与整个经济社会比重之间的关系，发现在不同的时期随着 GDP 的增长和信息社会指数的不断发展，研发的投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不同阶段的表现不一致，表现最好的时期就是转型期。现在我们正好处在转型期。只要多投入一点点钱作用就会非常之大。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转型期的机会。移动电话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数字生活工具，电脑和移动电话有很大的区别，互联网和家庭电脑的普及率是 35.2%和 31.6%，手机的普及率是 105.8%。当然，仔细再分析背后的原因，实际上也不难发现，手机的应用成本相对比较低，技术的使用难度相对要小一些，所以比较容易普及。反过来说，手机量一旦上去以后网络普及率应不应该上去？很多地方虽然手机量上去了，但是不具备上网的条件，或者上网的费用比较贵，目前中国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受到使用成本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普及也会受到很多制约。电信资费水平是影响当前网络普及的重要因素。把宽带技术占 GDP 的比重与宽带普及率之间进行对比，全球宽带网络普及率是 59.4%，如果比重占 GDP 的比重是 1%以下这些国家的普及率是 78.5%，到了 1%-5%的话比例就会降到

5%以下，如果达到5%以上的话就只有2.3%。以前我们曾经研究过，一项技术如果要实现普及，使用成本占人均收入的比重不应该超过1%，一旦超过就很难实现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得起。人们对数字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按照四大类指标可以看到，一旦人均的收入超过五千美元，对于生活方面的指数就会增长快于其它指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数字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对于主要技术产品的使用和偏好非常明显。而且在一万美元以下的这个阶段，国家为什么要大力发展信息社会？还是有一定的依据。信息社会准备期生态环境压力巨大，包括0.3以下也包括0.3-0.6，起步期有十三个国家，这些国家当中PM10的浓度是92.3%，转型期有六十二个国家，平均PM10的浓度是54%，这里也表现出了不同的信息社会尺度之下的排污标准，能源消耗系数也都能反映出。转型期是经济的加速期，起步期虽然也是能耗比较高，但是经济规模的量比较大，中国和印度的体量太大，发展又特别快。

4、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现在有些数据作为支撑，全球最高可以达到0.8989，最少的只有0.16，不仅体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实际上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国家之间，比如非洲和亚洲也是非常明显的。亚洲最高国家是0.8852，最低国家只有0.229。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除了原有的南北差距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数字鸿沟也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球数字鸿沟巨大，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已经达到了96.7%，最低的国家只有21%，手机普及率最高国家已经达到了214.8%，一个人好几个手机，最低的国家只有17.7%，从互联网手机普及率来看最高国家已经达到了96.6%，这个国家叫做冰岛，最差的只有1.9%。全球的数字鸿沟指数是0.92，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综合信息技术的使

用水平相比全球的平均水平落后 92%，相应的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的
数字鸿沟是 0.95 和 0.85。

(二)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情况

1、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体量增长得非常之快，但是相对而言，稍微有点
缺憾的就是整体的信息社会发展指数相对落后。从全球来看，中国信
息社会指数排名在全球是第八十八位，人均 GDP 是第八十位。从亚
洲来看，我们人均 GDP 在亚洲是第十五位，信息社会的指数是第二
十一位。我们刚刚进入中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相比我们排在
第三十二位，但是经济社会指数排在第三十四位，往后发展的时候我
们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2、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情况。中国正在加速向信息社会转型，可
以看到从 2007 年开始一直到 2015 年是 0.43，虽然现在还在转型期，
但我们是在努力进步的。非常遗憾的是，目前信息社会的指数和全球
的平均水平还有差距。排在前十位的分别北京、上海、天津、广东、
浙江、福建、江苏、辽宁、山东和内蒙古。这里北京、上海和天津的
信息社会指数都超过了 0.6。我们从地级以上的城市来看，深圳、北
京和广州等三十一个城市信息社会指数超过了 0.6，其中有一个城市
超过了 0.8，就是深圳，目前唯一一个进入信息社会中级发展阶段的
城市。排在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北京、广州、苏州、珠海、宁
波、佛山、上海、厦门、武汉。同样，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是
非常大的，东中西部的信息社会指数分别是 0.5489、0.3880 和 0.3721。
四大类经济指数在不同地区之间也有不同表现。2015 年全球信息经

济指数是 0.3795，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辽宁、山东、陕西和福建。2015 年全国信息网络社会指数是 0.3852。在线政府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好，今年的指数是 0.545，数字生活的成长不是最好的，大家对于信息产品接受能力越来越强，指数是 0.5538。我们预测 2020 年前后中国平均信息社会指数可以达到 0.65，那个时候可以进入信息社会的第一发展阶段，目前处在转型期当中遇到了很多矛盾和困难，未来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撰稿：张新红(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

编辑：张路

二、战略性引领传统媒体转型升级

(一) 构建媒体数字战略，紧跟数字时代需求。

战略问题从来都是重要的，对于媒体而言，特别是在这样的时代，首先确定什么是我们的战略，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战略的指导之下有一些方法。如纽约时报是作为教主，多年以来一直是称雄整个报业，从很多年前就做转型，纽约时报的转型是既领先又成功的，但是在去年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带领了一些人做了很长时间的，用了半年时间做调研，访谈 300 多人。既说明纽约时报的转型很成功，同时也说明纽约时报在数字时代的影响力没赶上其他的数字媒体。纽约时报提出了 5 项措施：第一是调整编辑部的职能，开拓一个受众拓展的职位；第二是组建数据分析，了解受众对它是什么反馈；第三是创建战略分析团队；第四是零距离贴近受众；第五是数字领先的战略。

纽约时报花很大的力气转型，现在全球的媒体也在步它的后尘。

纽约时报建立了自己的模式，很多海外的媒体、国外的媒体都在效仿。但目前来讲对于报业转型，没有一家敢说是成功、可复制的模式。中国日报从 1981 年创刊，我们把自己叫做一个新媒体，新旧是跟时间相关的，因为中国日报是国内创办的第一家英文日报，我们从一开始就直接引进了激光照排，我们从 1988 年开始用计算机，用终端写稿、编辑、制作、发稿，1995 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家新闻网站。我们也是在苹果商店最早上线的中国，在中国的媒体里面最早尝试数字阅读收费的媒体之一。目前继续做融合的尝试，大家知道 2014 年是媒体融合之年，以 818 指导意见为起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我们也在推进媒体发展的战略。一年以来，国内媒体也做了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这只是开始，中国日报也在做尝试。1981 年创办报纸的目的是为来华的外国人提供信息和服务。当时中国日报只有一份报纸。三年以后，中国日报已经有了美国版、欧洲版、亚洲版、非洲版等，共 14 份。我们 1995 年成立最早的新闻网站之一，目前也是唯一一家最大的英文网站。我们移动终端目前用户超过了 500 万，覆盖了全球 180 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开设了自己的账户，目前有 200 多万的用户。同时还为国务院的政府网做英文网，包括为 200 多家国有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商业机构创办了 200 多家英文网站。我们是最早尝试做数字有价阅读的，我们在加拿大的平台上，在亚马逊平台上面，都做出了收费的媒体。

《人民日报》官方网站上市了，就是人民网。他们的报跟网同时发展，但是是不一样的机构，中国日报更多借鉴西方的媒体主流方式，我们做成一个统一发展。这里说的统一是发展与物理的磨合，我们在一个编辑大厅里面集合了做报的、做网的，因为网络融合是最重要的，

才能够把不同的形态放在一起。前一段时间，我们从一家意大利的公司引进了一个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布信息的系统，这个系统海外媒体都是使用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渠道上面发布信息，真正形成一个“中央厨房”的概念。

（二）转变媒体融合观念，探索成功、可复制模式。

媒体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媒体融合虽然很时髦、很热，但刚刚开始破题，应该说国内的媒体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可被复制的模式，大家都是在探索之中。其中最难的一点，就是怎么样能够观念上、理念上入手，做一些尝试和变革，**最关键**是转变媒体融合观念。媒体融合不是各自的独立发展，不是说我把庄稼种在一起就是融合。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可以先做，我以通过杂交形成新的产品。但是**最关键**的是要转变观念，不是说大家在一起，通过不同的渠道发布同样的信息，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

（三）通过大数据及时把握受众需求，提供针对性的产品。

如何通过大数据及时把握受众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产品，也就是说如何通过受众的分析和市场的分析引领传统的媒体进行转型升级。如果说移动优先、技术驱动的融合发展的基石，受众驱动、市场引领则是媒体发展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保障，融合发展既是目标更多是手段，如果融合发展不能够满足受众的需求，不能做出快速的反应和针对性的调整，那么融合发展并不能自动地使我们的传统媒体打破萎缩的局面，开拓新的疆域。

1、内容为王，紧跟受众、社会需求。内容为王的法则是不变的，

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所接触的内容不是太多了，而是有价值的信息太少了。可能我们每天接受的信息太多，我们无所适从，所以说从传统媒体讲，我们有多年来积累的人才队伍。内容为王指的是必须跟我们受众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和海外的需求相匹配。否则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仍然不能够摆脱衰落的命运或者被市场所抛弃。

2、海量数据，用大数据手段了解受众需求。如何能够了解受众的需求，了解受众的需求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办法？比如在 1.0 时代，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读者调查、受众来信，2.0 时代我们可以通过点击的调查获取信息，未来要通过拉开数据的方式挖掘市场的信息。大数据的分析，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原子时代，又是数据的时代，

举一个例子，中国日报，我们在 2011 年的时候我们联合了中科院成立了新媒体实验室，成立这个实验室的目的就是通过海量信息的收集获取受众的信息、读者的信息，从而能够了解我们产生的海外反馈，甚至来预测一下我们信息，预测一下我们产品反馈。通过社会模式和计算，我们可以预算产品投放市场的时候，可能有什么反馈，因为大数据的核心之一就是预测。我们联合了顶级的机构，包括清华大学、中科院、社科院、传媒大学等一些顶级的机构进行新媒体实验。通过这个产品，我们目前能够实现对一万家新闻媒体、网站、数据库的数据采购，其中包括 4000 家的媒体，实现对美欧主要地区 300 余家广播电视台新闻采集和分析，覆盖超过 150 个国家，13 种语言。同时我们对推特、脸书等海外最热门的社交媒体做分析；参与中宣部牵头做的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提供模型、数据；为国务院办公厅召开的媒体吹风会提供一些数据，让他们对于海外、本领域关注的点有清

楚的概念等。

撰稿：高岸明(《中国日报》)

编辑：胡唯哲

三、完善在线平台机制，助力互联网企业国际化

(一)国际贸易在因特网时代的特点

传统的国际贸易是进口商和出口商彼此寻找对方并进行交换的过程。在今天的因特网时代，虽然情况发生了变化，但进口商和出口商仍需要寻找对方。

以阿里巴巴为例，它不仅拥有高水平的 B2B 平台，还有领先的 B2C 平台。据统计，在目前最大的电商平台中，阿里巴巴以 44% 排在扩展渗透率的第一，第二位是亚马逊的 22%，淘宝和天猫也都排在前五名。电商平台的形式正在促进该行业更快发展。

因特网时代的贸易具有以下特色：

1、进入门槛低。一般来说，把商品在网上列出来就可以出售，卖给外国人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很多时候，关税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太多的信用值就可以进入国际贸易的平台。

2、信息成本低。无论对买方还是卖方来说，线上电商平台都降低了信息成本，双方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经历来寻找对方。

3、交易过程的形式不同。在阿里巴巴的平台上汇集了交易量、交易价格、用户评论等信息。通过中国海关等数据来源，可以看出线上和线下的交易有以下区别：

出口方面，线下出口商基本都是向一个国家出口，而在线上，55%的出口商都是面向五个国家以上。**利润方面**，线上买方会有较高的毛利率，卖方获取市场会更容易。企业方面，在线形式对中小企业更加方便。**价格方面**，线上贸易的价格差异度相对较小。**买方与卖方的关系方面**，在线平台上买方的回头率比例比线下更高，同时买方和卖方的关系更加灵活，不像线下这么紧密。**信息方面**，之前交易过的买家会提供销售反馈，由消费者进行打分和点评。信息对于出口绩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卖方和买方都可以提供大量信息，起到引导的作用。好的评价虽然能使电商的销售上升，但却不能完整地反映产品的质量情况。比如阿里巴巴会对其评分进行四舍五入，因此电商平台的评价机制所反映出的差别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大。**稳定性方面**，线上贸易的稳定性较高，在金融危机时比线下销售更有优势。

将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线上贸易表现出以下优势：门槛低、贸易成本低、信用要求低、库存要求低**。同时，线上的卖家相互之间也会进行比较，获取竞争对手的信息也很方便，因此各电商在价格上差别不大，不然就会影响到利润和销量。从这些方面来说，线上平台是一个特别的市场。

如果关注线上领先的出口商，可以发现即使加入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平台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真正卖出东西。卖家需要在平台上培养名声并打造好的地位，通过这些才能吸引到消费者。因此，大规模卖家的消费者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小规模卖家则基本上以非常慢的速度增长。假设这些进口商仅能看到产品本身的流通的质量和网上的名声，并且买方相信这些信息是真实的，这就意味着卖家的声誉很重要，并通过定价和公布更多的产品信息得到提升。因此，**买方和卖方可以进**

行相互的抉择。在决策过程中，我们作出了以下假设：

1、高品质的出口商会把所有产品的信息都发布出来，以此提高声誉。

2、高质量的出口商最初会把价格定得很低，因为第一笔交易是非常关键的。在名声逐渐提升之后，价格也会随之逐渐上升，这是电商定价的具体机制。

（二）线上贸易的未来发展

通过对比阿里巴巴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利润差别，可以发现国际市场在阿里巴巴所占份额较小，淘宝和天猫是阿里巴巴最重要的市场，对国际市场的扩张则是下一步的计划。在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亚洲的未来是积极的，更多 B2C、C2C 将在电商平台上发展。从该研究中得出的启示具体表现在：

1、中小企业在出口方面面临很大机遇。这些卖家在线上平台之外通常还担任其他兼职的工作，有了在线平台不能保证他们卖出东西，因此要**建立更完善的机制，帮助这些卖家完成第一笔交易**。这对于那些离市场距离远的卖家来说更加有用，因为他们出口产品所要担负的物流费用非常高。

2、**解决信息交流不对等的问题**。线上平台在这点有着独特的优势。线上平台能够让后人不断学习，分析市场策略，了解市场的需求，从而带来大量溢出效应，在卖家和卖家群体之外带来更多的联系。

3、**丰富进口渠道，融合线下和线上平台**。比如，中间品一般很难在线下买到，而在阿里巴巴等线上平台就非常容易获取。借此可以达成线上和线下的协同效应，线下贸易企业可以从中获取竞争对手的信息，促使线上和线下更好地融合，并提升整体的量。

撰稿：Maggie Chen（乔治华盛顿大

学）

编辑：盛中蕙

四、站在网络空间看媒体，打造新型网络格局

（一）网络空间的基本格局

1、中美占据互联网发展主要格局。从网址民主的分布来看，互联网大概分了三个阵营，其中一个就是中美两国，网民加起来占了30%，人口在3000万以上，超过平均数的国家有21个国家，网民有9.5亿；这是目前网络发展的基本格局。

更重要的是，现在网民30亿，我们还有45亿人没有上网，下一个10年是一个发展阶段。接下来10年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变革，我们的很多研究和判断，不能站在过去和现在的角度上看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站在未来的角度看。网络是我们人类在网络空间大规模转移的时代，中间会进入到10亿人的在线的时代，大规模同时在线实时互动，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活动。

2、中美携手将主导互联网发展。一个更集聚的变化就是中美力量的转型，前两个是以发达国家为方向，90年代，美国的网民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二，现在占了9%，我们现在占到了20%左右，这是两国目前的差距。这两个国家的互联网公司，不管资本层面还是流量层面，用户层面，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全球50个网站里面，中美占了40%，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运营主体中，中美占了90%以上，所以中

美两国如果能够携手，基本可以搞定全球基本的格局。

3、下一个 10 年互联网网民增长主要来源的力量转移会加速。从整个格局来看，随着网民的增加，30 亿网民是以发达国家为主，下一个 30 亿，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网民的特性、群体构成改变了整个格局

（二）中美两国互联网治理的差异

1、中美两国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差异。目前来说中美两国主导着互联网，而且越来越深入，我们中国占的是主要的。苹果的收益会超过 600 亿美金，会超过华为全部的收入。过去的 20 年里面，我们两国之间的网络治理，美国因为互联网是他发明的，他有相关优势，中国主要是一个外资注入型的，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美国代表了独立相关模式，中国的模式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管互联，实际上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根据我们真正的研究，两国的互联网差异远远很大。

2、中美互联网治理的历程差异。当时由国家信息办牵头，从那一天开始，中国互联网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政府部门主管的，已经形成了去政府中心化的过程，所以在我的研究里面，实际上就是一种互联网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服务器放在中科院。通过这 20 年，中国政府在互联网里面起的作用比较小，商业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包括国际的力量，在互联网里面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低。

美国在整个互联网里面做的事情远远多的多，中国政府做的事情远远比我们看到的少的多，为什么中国的政府显得多？中国互联网是一个多主体的架构，美国政府能这么落后，就是因为其他主体的治理

都比较强，商业网民政府都是比较厉害的，当然有几个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压力聚焦在政府这里，这是一个目前的基本格局。

我认为美国的理念有很大的价值。第一个就是公共合作组织，第二是社会化，第三是各个层面怎么进行协同的能力，这三块是我们互联网最大的短板，这是一个基本内容。

在中国互联网，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在过去 20 年已经做了一个治理，中国政府认为他在管中国互联网，实际上管的非常有限，只是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细看问题。从整个互联网空间发展的话，其实政府是最好的机构，我们知道企业管理里面，一个公司成功的时候，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愿意参与，当然出问题的时候，各个利益相关方都不愿意参与，我觉得各有所长，应该是双轨制，而且包括体制内的力量都是这样的。

（三）未来互联网治理与新型全球网络格局

目前我们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过度扩大化以后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只能抓重点。在国际上，我觉得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一定要站在全球角度看中国，一定要站在网络空间看中国。

我们一定要站在网络空间看新媒体。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大量人还是站在现实空间看媒体，我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中美的博弈只会越来越接近。同样在美国，企业的利益、团体的利益差异是很大的，整个网络空间，欧洲、日本、韩国，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也有根本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把一路一带，把下一个 10 年最具有动能的板块，在中国把这一块利用好。我们只要把一路一带做好，未来 10 年的网络格局基本就做好了，当然中美之间要作为一个利益共

同体，合作还是我们的主旋律，因为时间在我们这一边。

这是我们最近做的网络发展指数，我们主要从网络空间领导力、生产力、国防力、文化力、发展水平、活动水平、治理水平衡量网络强国，我们希望下一步与美国进行对话。

撰稿：方兴东（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

编辑：张 路

五、开启食品安全云建设，探索互联网检测新业态

（一）贵州省食品安全检测检验的体系现状

1、“三位一体”的食品安全检测保障体系打造“贵州模式”。从2008年起，我们就采取一个新的模式，那就是说我们和政府监管部门，和我们的科学院共同合作建立了食品安全检测检验的体系。从2008年起，我们经过七年的努力，到2014年，我们变成了一个贵州省大数据产业的重点示范工程，食品安全云，这个是我们以检测为基础的，我们的检测，实际上就是在贵州省中心的一个分中心，建设了筛查、抽样检验、移动监测，三位一体的食品安全检测保障体系。这个保障体系率先在全国工商系统，成了典范，二十几个省市到贵州学习。行政监管和科学无缝结合的一个模式，被国家工商总局称为贵州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贵州省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形成了三道防线，保证了贵州省的食品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建立了从省、市、县，整个职能化分成12级。贵州的模式还是照样的，现在我们引入了社会资本，建立了第三方的机构，政府出钱购买公共服务，我

们现在县级的实验室，完全通过了企业的风险投资，我们建立了实验室。现在在贵州省，我们把三级的体系建立起来，通过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这个数据为食品安全云后面的建设，发挥了基础作用。

2、传统的食品安全体系存在的问题。对于传统食品安全体系而言，我们有数据，有设备，有人员，有职责，但是这些数据，政府部门或者是企业部门做了行政以后，大多数的数据是孤立的，也是脱离的，这是我们传统的检测。现在我们市场有需求，形成监管，这样我们也有业务，但是这个数据是不稳定的，增量也比较少，因此，我们就说现在传统的检测，这些数据主要还是比较孤立的。

(二)探索互联网+食品安全检测新业态

1、打造新技术食品安全检测的生态网。我们的食品安全云，通过软件、设备，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把自建的检测室和民营的、企业厂房的检测室，还有监管部门的检测室，还有我们等等很多检测室，包括我们的商超的检测数据，实验室的检测数据，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接入进来，形成一个新的检测检验，形成在互联网下面的检测体系。我们现在直接从 2009 年说起，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一个互联网下的认识的系统。我们通过建筑化，通过不同的模块，基于云的技术系统，我们建立了一个实验室管理的系统，我们就可以把分散的数据，孤立的数据，由非结构化数据，变成了结构化的数据，进入我们的食品安全云。这个现在已经在九个省市正在示范的系统，正在用的系统。

2、搭建食品安全云。我们从 2009 年，我们整个数据，从 1.0 到 4.0，在整个系统中，所有科学院联盟，我们来做这个支援者，管理

系统的应用和示范。这一次我们在贵州建立的三级实验室，来审核整个数字化实验室。那么，我们通过数据接入以后，干什么用呢？一个是为了公正客观的检测报告，这是本来要做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把数据库建立起来以后，我们正确地做一下食品安全的分析评估，检测预警，结合我们的监管部门，结合我们的大众媒体，做一个数据的支撑。我们和京东和阿里都要合作，要与电商合作。10月1号要实行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法》，对电商的质量要严格把控，所以我们先行一步，在京东的质量频道已经实现无缝对接，可以直接从京东的商场上下载，如果你要说检测，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的食品安全领域，再回到京东，这个技术上已经无缝的打通了。然后我们等待着商机的到来，等到大家都起来为社会共治而努力的时候，而我们这一块就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正确体现了互联网+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的一个新的探索。

实际上我们就是通过在食品安全云的平台框架下的检测体系，实现了互联网+的这理念，这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云。之后我们通过售后工作、电商、大众、政府监管、新闻媒体，还有测试应用等等，通过这些应用，我们把这五块和社会共治相关的主体结合起来，我们做数据的支撑。这个是在食品安全框架下的一个，政府通过我们的检测的话，然后从人员培训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达到一个给监管平台提供监测的数据。我们一千多家企业，都是时时上传他们质检的数据，通过我们第三方给企业送检，还有通过政府的抽检，这些数据都和我们企业质检数据对比。通过三种数据的比对，我们可以给大众还有给政府看到我们这个企业在自检的那些数据，为企业的品牌打造打下基础的支撑。通过我们三个数据的比较，大众就会看到；通过我们的APP和网站，就可以看到企业自己送检还有抽检的数据，他可以进行

比较，明码消费，倒逼机制，让企业更加注意，企业不再是孤立的，政府更加关注，这样才会达到效果。

3、形成互联网+食品安全检测新业态，包括数据统计、应用推广、提审服务，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通过大数据的集聚，然后应用服务，最后形成产业。这个就是现代服务业。我们这个新业态，到底可以成立多少个产业？比如说现代服务业，电商直检，通过我们今天的讨论，得到一些建议。**那互联网+食品能带来什么？第一从农田到餐桌，第二是打造了互联网化实验室数字化，检测过程标准化，检测体系信息化的产业链。**这两条产业链形成以后，我想对于我们食品安全的共治，一定可以起到真正的技术支撑。我们要通过三个关键技术，应该说我们有望在我们建设的过程当中，在全民都在关心的时候，我们对此进行关键技术的研究，我们可能有国家级的中心，还有国家级的食品安全创新体系，我们要突破三个关键技术。**商业领域要形成一种新的互联网+食品检验的商业模式，形成这种固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产品。**这一块的话，我想我们就按照 0.3%—1%来预测，市场可能每年会增加的，这一块的市场份额都是通互联网+检测检验的，然后我们再形成四类互联网的信息化产品。

撰稿：谭红(贵州科学院)

编辑：张 路

-----构建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建立完善法律机制，促进网络安全治理

(一)网络安全可能造成的问题

网络安全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它同时又涉及经济层面、军事层面等各方面。目前，从1995年的互联网浪潮到现在，各个国家的网络治理能力有了迅速的发展。很多时候，网络安全的发展很多时候是由反抗力量促进的。

比如，美国网络政策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受到俄罗斯、阿富汗、伊朗等国行为的影响，这些国家促进了美国网络治理方面的变化。

曾推动美国和中国建交的资深政治家基辛格曾在一本书中提到网络，表示非常担心网络安全对世界秩序的挑战。他在其中提到了经济竞争、大规模的军事破坏行为以及心理层面的问题，包括网络所产生的风险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

互联网发展在全球，尤其是在经济层面上是有好处的，但同时也对网络安全造成威胁，造成网络犯罪、脆弱性等问题。各个国家对计算机和网络有着越来越强的依赖性，另外，很多国家都陷入了避免在网络方面处于弱势的网络恐惧性之中。实际上，很少的国家能对各国的网络行为达成共识，在战略优势方面相互竞争。现在的主要瓶颈是网络的容量，以及网络大国是否有自控的能力。

对于国家和国家来说，很难判断对方的行动是否有敌意。这样的危险来自于无政府状态。通常所说的网络冲突包括经济方面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取，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间谍行为，以及心理层面的活动。

技术落后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成为不可忽略的因素。这是网络在社会脆弱性方面引起的变化，网络风险在实际评估中往往会超越某些战略和原则。

(二)针对网络安全问题的网络治理

网络治理是针对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基辛格看来，为了避免战争并维持世界的秩序，要尽可能消除不稳定因素。为了减少网络造成的负面影响，必须通过管理来应对计算机和网络竞争带来的不稳定性的冲击。稳定性的基本要素包括推迟危机的到来以及双方的自控。为了控制风险，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推迟危险发生的机制。

完善的网络治理能更有策略地延迟危机，并让各国政治家了解风险，更加小心，少犯错误。核危机是谁都不想看到的，然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却可能让核系统比以前更加脆弱。这就要求对可能的危机进行管理。

在建立网络和合作机制时，政治家不能感情用事，而要用智慧去治理。潜在的网络方面的威胁可能对政治、经济、军事和知识产权以及科技方面造成冲击。造成国际安全不稳定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对军事进行遏制时的信息不足。美国正在考虑不同系统之间应该采取怎样的刺激互动机制，比如在不安全信息的刺激下会增加核武器装备的投资，以此增强国家的稳定性。

政治家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必须保持清醒，所做的判断也是有风险的。比如网络袭击可能会针对第三方的基础设施，从风险的角度来说也有偶然的冲突和不受控制的冲突升级。另外，还有金融方面的危机。目前世界各国都大量使用因特网，在加快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挑战。

有时 these 问题是难以避免的。

(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网络治理

1、经济方面，网络袭击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对于美国、日本、欧盟，针对这些国家的网络空间袭击会对全球的金融和贸易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袭击对象很多是基础设施，比如说金融中心、电信、能源设施等，这些袭击会刺激金融危机，同时也导致金融投资者无法调动资金。网络攻击者主要是针对这些领域进行蓄意袭击。

由于不安全性，对网络空间的袭击会影响到国际贸易的秩序。很多来自公司 IPI 的机密原先都被视作为公司的竞争优势。部分受到袭击的国家都在试图通过组织提高对网络袭击的应对能力。它们可以采用 WTO 的贸易机制，或者使用某些国家的法律来制裁这些网络袭击，使用民事行为恢复由于网络袭击所带来的损失。比如，可以根据知识产权盗窃的情况屏蔽掉某些重要产品，并对流氓业务和国家进行制裁。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安全性和私密性的担忧会影响到贸易的交流，因此有必要采用 WTO 的规定确保国家的安全性。另外，从风险的角度来看，网络袭击会对企业带来重大的冲击，一些国家和企业会对其他的国家和企业进行商业上的间谍活动。

2、政治方面，必须制定一些国家之间、空间网络之间的法律法规，通过不断改善技术来更好地应对网络空间的袭击，治理网络空间的秩序。很多外部宣传以及关于内容方面的质疑会对政府带来负面影响，煽动公众情绪，使政策制定者难以维持稳定格局，这种情况也将导致国家局势更加恶化。在此过程中必须遏制网络空间的袭击。

3、军事方面，有必要讨论军队和网络原则之间应该如何进行互动，提高危机的稳定性，避免不安全的两难局面，消除风险高的领域。这就要求军事和网络的专家之间进行有效的互动。

另外，必须保护金融机构设施的持续性和标准化，同时考虑通过制订规则来减少国家之间的间谍行动，特别是当这些间谍行动是针对金融行业时。在 WTO 的机制中已经得到明确，对各方来说保护知识产权都是有利的，因为只有在稳定的系统之中才能促进各方进行创新和收回投资，一个稳定的贸易体系能减少贸易方面的冲突。

为了改善全球 ICT(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供应链，必须先优化 ICT 的基础架构，并对其进行替换。目前已经签订了以 WTO 的零关税贸易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协议，我们必须在此过程中进行修改，不断提高产品的网络安全性，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执行模式。如果某些国家想要获得税收上的优惠，就必须提高它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性。

撰稿：John C Mallery（麻省理工大学）

编辑：盛中蕙

二、创新互联网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执政能力

(一)互联网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

首先是一个新型的舆论空间。现在的网络舆论空间是以微博为主的舆论场，主要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同时对地方政府构成了一种压力，形成了西方监察式民主的作用，从这方面来讲是有积极

意义的。目前总体上来讲是针对个体的，包括我们所谓的调查记者，通过微博曝光扳倒个别腐败官员。其次，作为媒介的互联网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却越来越多的使用传统媒体管理方法管理互联网媒体；再次，互联网正在把我们网络媒体、新闻业从过去的严肃性快速地推向娱乐化、软性，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察。

在这种观察之下，我们看到了互联网舆论下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方面随着传统媒体活力的下降，主流说主流的话，民间说民间的话。另一方面即便互联网媒体如此之热，依然是低端网民比较活跃的舞台，由于是基于社交媒体，他们越来越难听到不同的声音，选择性的确认使人们更加强化固化既有的偏见，尤其是关于社会话题，网络舆论化的倾向和非理性的表达比较明晰，人们最后的观点最后无法形成共识。

还有一个缺憾是舆论没有真正围绕中国的问题展开，而是围绕具体事件展开的，这意味着不论是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还是对于雾霾治理的紧迫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在传播的过程中被阻断，所以无法让大家形成一个对具体问题的共识，包括毕福剑的视频也是这样。

(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应对方式

在过去 10 年，我们看到国信办和网信办监管权加强，网络法制化加强，过去几年来宏观治理上的一些变化确实让多元的治理权利更加集中。例如约谈十条，虽然这个的执行需要打一个引号，还有 2012 年以后对于大 V 的管理；互联网舆论的管理纳入到互联网管理的口径，现在强调对新媒体要进行统一口径的把握尺度的统一；还有放大

正面声音的尝试，包括商业门户网站的头版专区的征用管理等等，我们都看到了整体上国家对互联网的治理方式是行政和法制并存，基本一个是借用，一个是发展，所谓的借用就是把传统媒体、内容管理的方式引入到了互联网当中，另外就是对互联网本身成为非法外之地。整个调控方式也越来越精细化，发布之前政策时机的选择、大V的透露，还有各地方政府的响应，就是用传统媒体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加上新媒体法制化的倡导，两种手段结合。

通过对浙江案例的观察，我们发现地方的政府治理模式趋于全能化，互联网法制化在地方寻找到了法律触角，不仅包括网民、新闻编辑、网警队伍、网络技术人员队伍，还要在地方实名制，商业网站的编辑也应该纳入进了管理。另外，原来地方政府只是管好自己的政府平台，现在最头疼的是市场化的平台，也就是地方的论坛和地方的网站，这方面他们采用了账号管理、账号通报和存储的制度，试图通过地方的微博微信发出声音，同时又通过强势的管理让市场化的平台加以服从；

但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堵住关于本地的负面谣言，另一方面又希望借此对本地维稳提供服务。于是在地方的网络治理之后，我们确实看到了批评的声音减少了，公民的表达变慎重了，但是地方的舆论也更加和谐化了，地方长官的压力变轻了，这让我们担心国家层面上所做的制度设计落实到地方治理后，会成为地方政府滥用权利的来源。

所以当我们谈互联网治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期待多元化的机构参与，治理应该存在边界，防范各个集体的权利依赖。

(三)微博治理对策

从宏观上来讲，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公民参与都非常重要，采取网络法制化的治理手段本身也需要更加透明化和清晰化。过去过于重视对敏感性问题的监管，一定程度上在地方网络治理过程中也有隐忧，同时对侵犯隐私的情绪有所放纵，**以微博治理来说，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一个是法制的建设，第二是营造理性的讨论氛围。**

当社会有争议性话题的时候，主流媒体要能够提供事情真相。过去的网络治理方面，国家宏观设计确实在法制化上做出了积极的尝试，行政监管也开始做调控，地方也在进行互联网治理，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充分的法制化和科学化的倾向。在这些引起公众关注的问题讨论背后，出于地方维稳的需要，常常缺乏真实大胆的舆论空间，所以从宏观层面上，我们希望加强互联网表达空间的规范同时，让专业媒体在网络舆论中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撰稿：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编辑：史晋星

三、抓住网络强国，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

中国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进入了信息化进程，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社会发展变得更加复杂。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中国要由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但是其间遇到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核心技术还不在于我们的手上，来自互联网的威胁甚至超过来自天空、海上和陆地的威胁。

（一）中国互联网治理面临的综合性挑战

第一，中国的网络规模、网民数量、手机用户数量、手机上网用户数量、社交网络与即时通讯工具数量均达到了全球第一，这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正处在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虽然不是世界最高，但由于体量很大、人口众多，所以呈现出来了一些挑战，即“五个全球第一”。中国的网络规模是全球第一；中国的网民数量是全球第一，已经超过了七亿人；中国的手机用户是全球第一，手机用户已经达到十二亿，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已经接近七亿；直接用手机上网的人数全球第一；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工具数量全球第一，阿里巴巴、新浪微、腾讯微信等等的注册用户数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十五个亿。

第二，快速的网络交易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去年，网络交易的参与人数在去年已经超过了三亿人次，网购的交易额也超过了三万亿，电子商务去年的交易额则已经超过了十四万亿。这一切都快速地把中国消费互联网推向世界。

第三，网络参与、网络表达和网络事件对互联网治理带来挑战。最近刚刚列出黑龙江的庆安事件，这种参与网络表达已经程度。

第四，网络违法和网络犯罪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违法犯罪包括虚假信息传播、侵害个人信息等等，这些都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二）中国政府网络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数亿计人参与的过程中，现行的政府网络治理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府管理体制弊端日渐显现。三十多个部门和政府机构都是标准管理，这就存在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等多个管理体制问题。

第二，对网络媒体的应对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政府缺乏管理的精力和能力。

第三，在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方面存在整个互联网治理的短板。网络治理的很多方面缺乏法律依据，容易引起非常不好的影响。

第四，核心技术不能自主可控给国家网络安全形成了很大的制约。目前中国有自主可控的计算机技术体系，但没有形成自主可控的软件技术体系，也没有形成自主可控的微电子体系。中国的技术研究仍然以跟随美国的技术研究为主，技术上受人制约。

(三)关于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是实现网络强国的重要途径，互联网治理是一篇大文章，要在“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的方针指导下，通过以下八个方面的多管齐下，提升网络治理能力。

第一，要在观念上变以往的消极管制为积极开放，探索合理有效管理的前提下开放，兑现构建一个开放互联网的承诺。中国有一亿多人在翻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应当通过合理有效的管理改变这一现象，构建开放互联网。

第二，领导体制上要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纽带，构建互联网治理的体制机制。

第三，围绕网络安全、网络信息内容、信息化基础设施等关键节点提供规制，然后组建相应的责任机制。

第四，发挥专家咨询的作用。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下设立权威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涉及国家互联网治理以及信息化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咨询服务。围绕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用好包括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等在内的多方面资源，发挥专家咨询的智慧作用。

第五，在机制上要突出严格执行、令行禁止。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克服网络治理中的部门利益，并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和信息审批制。

第六，在治理方式上要树立法治思维，注重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建设，逐步形成以依法治网为主，辅之必要的行政手段的治理方式。不能长期以行政手段替代法律治理，这样只能把治理变得越来越枯燥。

第七，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例如，在对内容的治理上利用大数据建立一套舆情预警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应对机制。

第八，创新互联网的治理新格局，动员社会力量共治共建，形成良好的共治氛围。

撰稿：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编辑：施含宇

四、从五个方面应对“互联网+”法律障碍

（一）“互联网+”目前遇到的法律障碍

新兴的“互联网+”的行业和传统行业在融合的过程当中产生了

冲突。如何理解公平竞争？互联网+电子商务这样的领域和享受的创新带来的特殊政策是不是合理合法的？这些特殊政策在工商、税收和行政许可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非常突出。

1、制度设计不全面。大家可能会想，既然你要“互联网+”，工商该登记就登记，该交税就交税，该取得许可就取得许可，原则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实际情况远远没有这么简单。现在京东和淘宝都是下到农村搞村淘，前一段时间《食品安全法》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现在农村电子商务很多都是食品，或者是地方特色的农产品，要有食品销售的认证和许可证，作为一个农民就是一个个体户，没有那么多厂房和员工，能不能取得这样的许可证？新兴产业不是一定要求免税或者不工商登记，确实在有些地方是有实际的障碍，因为当时这些制度的设计是没有针对“互联网+”的行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的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例子比较少。

2、商标库的信息化有待完善。今年年初工商总局和阿里巴巴这件事大家关注得特别多：工商总局和阿里巴巴是不是有钱任性了？平台应该负什么责任？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年初也是这样，工商总局的商标库基本上是不能查的，如果我是一个平台，一个产品要查它的商标，到底是不是这个权利人的？查不了，工商总局没有把自己商标库的信息化做好，反过来要求平台必须把知识产权的认证辨别做好，刚才我们提到的食品也是这样，到现在为止我们食品许可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信息库，阿里和京东要在网上查这个人提交的食品许可证是不是PS根本查不了。

3、新兴资产在现有法律体系中没有准确定位。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主体和客体，比如交易平台、支付平台、Q币、虚拟财产、信用

和店铺，这些资产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当中无论是债权还是知识产权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包括现有的商业银行法没有涵盖这些主体。

（二）互联网治理的对策建议

1、放宽互联网治理的秩序和规范。我们在理解互联网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生态，这个领域就像一片杂草一样，什么物种都有，大鱼吃小鱼。互联网的治理一定不是搞成横平竖直，这种所谓的混沌是生命力的表现。

2、转变治理思维，有机化治理复杂系统。复杂系统是专门的系统科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系统越复杂越简单，复杂系统中决定系统走向的恰恰是偶然因素，并不是可以量化分析的结果。决策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复杂系统的理解和对于治理方式根本性的变化，否则我们的立法、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规范一定是错的。政府和法律研究人员需要在治理和法律政策方面针对互联网事物有机性和群系统带来的自身的变化做出调整。

3、“非人化”的治理手段和原则。淘宝的网站员工应该是不超过一万人，阿里巴巴是不到三万人，这样的一个企业管理了四亿的消费者的，去年一年处理纠纷大约七百万件，而全国的工商系统去年处理的纠纷大概只有七万件。淘宝上不到一万人处理的数量是工商系统的一百倍。这些企业无论是腾讯、阿里还是百度，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大部分都不是人做的，是机器、软件和系统做的。

美国研究互联网治理有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的黑客高手并不认可法律，真正能够阻止他的是程序设计。这种认识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淘宝上这种交易有一定的程序设计，这种设计使得你不太可能做对。

怎么理解这种代码设计？这是我们家的楼下，应该是自行车库，出了这个门以后是大下坡，所以自行车会越来越快，左手其实是一个岔道，这个时候如果不太注意的话根本刹不住车，物业管理有很多注意事项，这就是我们说的法律，后来有人就加了一个治理规则，只要有这个坎，你肯定会减速。这个其实是目前互联网治理的法律、技术、代码和规则共同起的作用，真正的技术大卡眼中管用的是这个门槛，政府立法者没有理解到治理的变化。

4、把握“放”和“管”的尺度。“放”主要是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宽进，然后明确三张清单，电子商务到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行动执法方式，“让子弹飞”的原则是沈飞教授的结论。支付宝是在 2004 年诞生的，如果按照支付清算组织的严格管理，这家公司是违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执法，到了 2010 年的时候，也就是六年以后我们才真正给第三方支付公司发牌照给身份认可，六年之后身份是灰色的，如果执法严的话可能就关掉了，如果是松的话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马上执法，这种情况在第三方平台和跨境电子商务，包括税收、工商登记和物流都普遍存在，其实是电子商务能够走到今天，在政策治理和法律上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急于把它纠正过来。

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就像支付宝这样的案例一样，包括 UBER、支付宝和跨境电商税收，我们可能会批判很多的管理部门，但管理部门也会觉得很冤枉，我确实是按照法律规则和规范文件来做的，因为规范文件就是这样要求的，确实是这样。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冲突，如果按照政策的大方向他也明白是应该放的，如果就法律的具体条文的话这个事物确实是不合法，确实是有法律上的瑕疵，怎么平衡这个关系？是不是要达到很具体的法条和规范性的文

件？这种判断确实是很难做到，有的事物确实是有这样的两面性。这个事物违反的是法律条文，这是要肯定的，同时有没有违反法律的原则？如果法律条文也违反了，又违反了法律原则，比如诚实信用、公平合理，如果这些法律原则没有违反的话我们先不要暂时把它封杀，要看是不是符合政策的取向，如果政策取向是符合的我们再往下看，看它有没有影响其它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也是合法的。

最后是创新可能在某些方面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但手段有没有瑕疵？有没有属于欺诈、隐瞒、胁迫和传销？如果是这样还是必须严格执法。虽然看似是违反了法律规定，但是符合法律的原则、符合政策的取向，同时又没有采取非法手段，我们要有抓手有落实。

5、有效规范平台的问题。现在“互联网+”也好、电子商务也好，包括 UBER 和途牛、淘宝都是平台的问题，包括它的责任、义务和发展趋势确实缺乏一个非常明晰的判断，某种程度上平台发展得很快、复制得很快，但解决问题的能力肯定不如商务扩展的能力，如何给它一个有效的规范？现在对于这种电子的文件、电子的记录、电子的发票、电子的档案，虽然电子产品法解决了一部分，但还没有承认。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去年年初阿里有一个虚拟信用卡，后来银行就有政策认为信用卡没有面对面的审核，除了把这种电子逻辑打破之外，现在大量的法律不支持虚拟方式。电子商务互联网+遇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仅是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可能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政府诚信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反映到互联网当中。最后就是所谓的“互联网+”一定是政府，如果政府不加入进来，所有的“互联网+”都无法实现。

撰稿：阿拉木斯（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

五、正视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构建互联网生态平衡

（一）理解舆情背后的诉求，正式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舆情的背后是一种真实的人群诉求，网民背后是公民。今天的互联网上面出现了左和右的多重利益诉求，背后都是真实的社会群体的喜怒哀乐和运动。今天我们要从关键词、敏感词治理，只是一个又一个突发事件，背后都是真实的网络社群，意见领袖是各种网络社群的代表人士而已，我觉得要转向社群管理，要听得懂网络贴文的弦外之音，正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要让利益博弈更加透明、更加公正。

（二）警惕大 V，警惕越界发言的网友，包容中 V。互联网上的网友大 V 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做包容专家型网友，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理清建议，但是要警惕大 V，警惕越界发言的网友。一些投资专家和房地产大亨是经济方面的专家，但经常在网上讨论的是政治问题，甚至是专业门槛很高的法律问题，我觉得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获得一千万粉丝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还是网络舆论的泡沫。今天一些大 V 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是涉嫌吸毒，已经退出了互联网，这可能是一件好事，有利于还原互联网的理性生态，同时我们提出要包容中 V，孙晓这样的专家发言是靠谱的，包括在武汉五道杠少年七岁看人民日报，四岁看新闻联播，当时孙晓作为著名的青少年专家说他是未成年人，社会可以批评他的父母，不应该曝光这个孩子。

（三）优化新媒体人才结构，提升综合知识素养。传统媒体也不例外，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我们都盯得很紧，党管干部、党管宣传口径，但现在都办了微博微信客户端，在新媒体上的影响力扩展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同时新媒体上把关不太严谨，有的时候也轻率地转发了未经证实的消息，放大了某些偏激的情绪。微博微信客户端受众定位可以不一样，传统媒体人才结构相对理想，新媒体人才结构严重偏差。微博微信和很多央媒的部门知识结构比较单一。现在很多新闻报道是专业性程度很高，但是这些大牌的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部门都是骨灰级的网友，缺少医学法学科学方面的专业素养。没有受过传统媒体流程的严格训练和约束，容易沾染社交媒体道听途说、好勇斗狠的习惯。

（四）关注弱势群体，加强政府扶持。网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大家最关心的，我觉得也是两个方面：正如习总书记去年对民主党派的希望，希望网上的公知分子多建内知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尤其是律师和媒体人，一方面是维护司法公正和舆论监督，另一方面也在法庭外造势，包括媒体人在自媒体上的发言变得比较轻率，有些事实在本单位没有得到发表就拿到自媒体上面发表，但并不是严格的新闻发稿流程的审核和约束，也容易变成扭曲事实真相的倾向。左翼某种程度上不是意识形态的左倾，而是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的呼声。朱镕基总理说过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多达两千七百万，比下乡知青回城的一千七百万还多一千万，那个时候诞生了那么多伤痕文学作品，包括《今夜有暴风雪》，但比回城知青还多一千万，至今几乎没有一部给人印象深刻的文艺作品来反映他们的呼声。今天网上的这些弱势群体真实的诉求，但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教育，也不了解普适价值，他们

驾轻就熟地拣起了文革时期的政治术语，用修正主义和四人帮的政治理念批评今天市场改革当中出现的市场竞争不公平、司法不公正等等。今天网络语言的某种左倾说到底可能未必是意识形态的左倾，而是实实在在弱势群体亟待全社会关注、亟待政府的扶持。

(五)鼓励微公益网友，引导青年一代积极转型。政府要特别鼓励邓飞这样的微公益网友。当年邓飞是专门记录社会的瑕疵和阴暗面，比如著名的江西拆迁自焚攻防战，近年来邓飞转向做免费午餐大病医保，这代表了年轻一代积极的转型。中国社会还是需要这样的建设性姿态，邓飞有一本畅销书就是《柔软地改变中国》，我觉得特别需要在新媒体人士和网民当中倡导柔软改进的操作策略。

(六)加强对新媒体人士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让新媒体人士从边缘回归主流，网上的极左极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缺少和政府机关对话的机会。左派为什么叫得那么厉害？还有就是缺少在主流媒体发言的机会，没有机会在报纸上写文章，没有机会在电视台亮相。越是边缘化越是激进化，所以需要把他们从边缘拉向主流，提供和政府有关部门对话的机会，尽量把他们从社交媒体拉回专业媒体。从 Twitter 拉回新浪微博，从新浪微博拉回市场化报纸，从市场化报纸吸纳到我们党报、国家电视台和主流媒体，跟主流社会对话有利于减少社会的内耗。还要消除职业网友，就是让我们的网友有一个体面的、稳定的收入，职业网友往往是流民物产者的心态，对抗性较强，越是中产阶层越是建设性的。还有就是鼓励在专业领域建言，鼓励专家型的中 V，中国转型期的很多矛盾不是政府单方面的问题，盘根错

节，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互联网不要去关注高大上的顶层设计，我们更多地引导和关心社区的改善，从身边的社会改良做起。还是要放开专业媒体，今天面对自媒体的舆论压力，把挖掘还原事实真相的专业媒体、科学专业的人脉资源，能够理性地分析社会现实的专业媒体放活，可以减轻网络自媒体的压力，不要高估网络自媒体。前几年我们网民就有几亿个公民记者，但是从马航 MH370 事件，迄今为止有关失联的真实原因有效信息恐怕不超过一千个字，今天还是需要用专业媒体对冲网络自媒体。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门缝应该开大一点，国家网信办的舆论压力就小得多。

（七）从网络治理到社会治理，科学看待网络治理的目的。现在地方政府部门往往关注的是互联网一个一个热点事件和舆论压力赶紧灭掉。但我们还要看到互联网是社会的减压阀，并不是越消停越好。有的时候网上太清静街头就不安定了，上网减少了上访，上访减少了上街，这是很多基层干部深有体会的。互联网应该是一个生态制，政府不要扮演全职全能的网络警察，应该让社会阶层借助互联网这个公开的意见平台表达利益诉求，形成一种利益表达、利益博弈的透明、公正和相互对冲制衡的机制，左和右、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和草根都有生态的平衡，哪一方面完全压下去了对社会未必是福音。互联网要协同治理，我觉得今天与其去管内容、管网友，更应该去管平台。发展网络统一战线要协调好社群，这次中央平台工作会议已经破了题。希望互联网能凝聚共识，避免撕裂。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我们要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有的时候在互联网上获得话语权的第一批网友变得不愿意在同一个屋檐下对话，互联网让我们离公民

精神反而更加遥远。今天的网络管理要亮剑和培养共识并举，亮剑就是开展舆论督政，清除有害信息，批评错误违法的言论思潮，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凝聚社会共识，互联网不是简单的灭火部门，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赢得民心。网络管理说到底是要为 510 项一年内两次中央全会提出的深改措施营造很有利的氛围，凝聚社会共识、振奋民族精神，不是加剧社会撕裂，社会转型还没有起步或者刚刚起步就在意识形态纷争当中陷入社会的思想混乱和人心的闪失。网上所谓活跃的公知只是知识界的浅层，三院院士学部委员、全委会委员都不在互联网上，他们可能有马甲，但没有公开发声，声音就不能让社会及时听到和聚焦，所以要引导更多的教育资源。媒体最有价值的是专业期刊资源，加厚互联网的文化涂层，培养互联网的文化弹性。

撰稿：祝华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网络舆情》杂志）

编辑：张 路

六、网络空间治理的发展建议

（一）网络空间治理的背景

从电商发展的角度来看，网络使得原先物理空间内的经济活动有了新的平台和形式，带来了很大改变。

有些改变带来的效果是好的。例如，浙江丽水下属的龙泉县，铸造龙泉剑已经有 2600 多年的历史，已经形成当地主要的经济支柱。但是在今天，法律规定，刀剑是不可以售卖的，尤其不能开刃。这给

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难题。不过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公司与龙泉警方合作，对当地每一个制剑的工厂做出的每一把剑进行编号。在网络上售出后，都可以按编号追踪到买家。电商公司用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龙泉的问题，既没有违反法律，也把龙泉剑这个产业做活了。

不过也有一些变化是不好的，比如现在流行网络诈骗，很多人都上过当。这是因为不法分子在今天的网络化的购物过程中，有机会获得很重要的信息。典型的诈骗案例就是，买家刚刚买了什么东西，相关的信息很快就被不法分子得到了，他就利用这些信息，去欺骗买家。受害人会觉得这些信息应该只有卖家和我自己知道，所以就很容易轻信。

（二）治理网络空间的必要性

网络空间对物理空间造成了改变，传统物理空间的治理模式受到了新挑战，这种改变目前看来是无法倒退的。这些改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物理空间的边界和秩序现在不存在了；第二、网络传播速度非常快，影响非常大，买卖交换一样物品，比如说毒品，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很快地传播，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卖出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消失了；第三、网络空间催生了新的产业业态，例如现在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人们打车出行等等，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些变化在不同的产业里带来新的挑战。**

我们仍然以网络诈骗为例。网络诈骗发生，主要还是由于网络空间里面的信息泄露问题。技术上我们在想办法，我们也在积极地记录详细的信息，帮受害者分析骗局，帮他们追回钱款，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无能为力。

骗子永远不在本地，可是公安的体制是属地化的，我们其实搜集了大量的信息，非常希望能够提供给警方，但是警方因为自己工作机制的原因，没有办法去查案，更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积累的数据。警方如果想应对现在的新情况，做出改进，就必须打破原来的工作方式，建立一种非常快速的、跨区域的合作机制，建立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现在不是我们企业不愿意合作，而是我们去找警方，警方让我们回来。

这表明，传统的网络空间治理思路，乃至传统的物理空间方式，都需要顺应目前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相应的改变。

（三）网络空间治理的政策建议

今天我们或许不应该把网络空间的治理和物理空间的治理分开，它们可能是一体的。在过去我们比较强调网络空间是现实空间的影射，现在影射两个字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关系，延伸这个词或许更加恰当。现在网络空间不仅仅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其实是把我们物理空间的事情借助网络空间一起运作，因为它是融为一体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网络空间的治理本身应该是物理空间治理的延伸，网络空间的治理不能完全脱离物理空间的治理。就像龙泉剑，如果没有当地的警方是不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我们应该结合本地和网络共同治理，比如说打击诈骗，应该是网络空间和当地警方一起做才能做到。

第二，利用网络空间的优势创造新的治理模式，解决物理空间的难题。网络空间的特点都可以转化为治理行为当中的优势，例如快速、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还有可追溯的优势，都可以让物理空间的治理变得更好，反过来也把网络空间治理得更好。现在都讲 O2O 模式，

其实在社会空间的治理，网络空间的治理，可能也需要这样的模式，我们应该进行创新。

第三，坚守基本理念和底线，解决跨国网络治理。如果在一个国家之内，网络治理比较容易，如果跨国的话就更加复杂了。因此我们在此提出一些基本理念：第一、我们在心态上面应该积极应对这种问题，只看到网络空间的麻烦，不看到优势，这不是一个积极的心态，我们应该努力改变过去的传统治理模式；第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我们做的一切努力应当基于本地的文化、法律，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强管有多富裕，做事情都应该遵循当地的文化、法律等等，大家全部是平等的，所以需要 O2O 模式；第三、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有些改变会触动我们原来整个社会的机制、流程、方法，还会触碰到很多人的利益，但是一旦做成功了，就会带来很大的机会，会真正改变我们的社会，让我们向着更美好的世界发展。亚洲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亚洲文化多样，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在亚洲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典范。

撰稿：杜跃进（阿里巴巴集团）

编辑：焦露曦

-----共创民生中国新常态

一、明确食品企业责任，保障企业食品安全

食品生产企业，是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承担者。作为生产企业，

怎样更好地履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越是大的企业，越应该要重视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生产企业，首先要有良心，有担当，违法添加等等都是不该存在的。其次，龙头企业应该起到引领整个行业食品安全发展的作用。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食品安全工作。

（一）从系统的、宏观的层面，完善制度、标准规则，形成一个食品安全的体系。茅台从1994年起，经过了认证，通过了食品安全、环保、健康、加工等方面的检验，现在是六大体系整合运行，奠定了较好的管理系统，具有管理设施，以及先进的技术标准体系。好的管理体系应该有完善性，覆盖整个生产流程，直到食品流入市场，这才是一个标准的管理体系。在这其中，食品安全标准是重中之重，也应该不断完善。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可能还不够全面。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是参照国际国内食品九类的标准制定的，对于污染物的限量，参照了日本、欧美的相关法规，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逐步完善形成一个覆盖全国企业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这个食品安全的技术标准，是指导食品安全工作的最高规则，也决定了食品安全管理的整体水平。

（二）企业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预警体系。说白了就是炸弹在哪里，你要把它挖掉，我们要进行一些食品安全隐患的甄别工作，对这些隐患进行控制。我们要对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进行综合分析，进行风险评估，从最后风险评估的结果中，总结出需要加强管控的严重隐患，补充到我们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当中去。

（三）打造一个食品安全研发和监控的平台。首先是对自身的监

控,要对企业自身生产过程中食品接触的器具等物资,进行监控考核,对包装和食品安全质量进行全方位的监控,确保质量稳定和食品安全。

其次,一个企业所使用的生产材料往往是来自许多其他产业的产品,对于这些产品也要有一个评估体系。这个评估体系要针对采购的物资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这种评估一定要制度化,所有采购来的新材料、新产品,使用之前必须要经过评估,这个评估就是借助国外一些标准的体系进行评估,确定没有风险,才可以准入。针对特别关键的物资,例如包装用的玻璃瓶,瓶盖等,要把供方纳入我们的环境体系里面,定期对它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体系进行审核。有些供方企业,例如陶瓷,玻璃制品等产品的生产企业,他们的工业化程度没有那么先进,我们必须对它的原材料以及生产过程进行风险评估。这样才可以避免输入性的风险。

再次,企业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遇到了所谓的问题和风险,就应该去探索解决方法。企业可以自己摸索解决办法,通过引进人才,以及购买最先进的设备等方法来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就是要通过产学研合作,针对一些新的材料,新的制品,新的指标,即时开发保障食品安全的方法,确保整个食品安全监督体系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四)对生产当中的各种数据,包括来自于市场的数据,要进行定期分析,不断改进问题,完善标准体系,实现食品安全管理的良性循环。任何事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进行持续改进。通过定期分析生产中各种数据,以及来自于市场的数据等等,企业可以检视自身是否存在问题。如果有问题存在,及时改进,同时举一反三,不断

完善标准体系，实现食品安全管理的良性循环。目前茅台集团一直在自己的科学院构想，怎么利用大数据的契机，形成茅台的食品安全的云端大数据，在各种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完善我们的体系，不仅有我们自己的数据，也有来自全国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们的食品更加安全。

撰稿：王莉(茅台集团)

编辑：沈轶敏、焦露曦

（一）食品安全问题三大来源

第一，自然灾害或环境污染。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应为营造一个绿色安全的地球大环境出一份力，以减少或控制这一方面的食品危害来源，食品安全云的建设中也涉及源头数据的获取。

第二，食品加工过程中由于加工工艺客观产生食品安全问题。自己在家做饭或餐饮酒店的厨师为我们烹饪菜肴时，由于高温会产生很多有害物质。企业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也会由于工艺问题客观产生一些食品安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企业、消费者都应做一些工作。政府方面可以做一个类似食品安全云那样的风险暴露的调研，这样一个数据库只有政府或大型云端才有可能建立。对于企业而言，可以改变加工工艺，使其更加绿色健康。例如传统的粮油加工过程中可以加入更多绿色产品。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养成良好的烹饪习惯以避免高温产生的食品安全危害。

第三，非法操作。之前提到的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人以及政府发挥监管

作用都是针对非法操作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政府应发挥监管作用，查处问题企业，而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承担这方面的社会责任，接受政府监管。

（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四点建议

第一，企业应重视品牌建设，把食品安全放在重中之重，最大程度减少由于非法操作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应发挥监督、监管作用。消费者应加强自身的防范意识，并且应该理性而非盲目获取这种防范意识。食品安全云就是理性获取防范意识很好的渠道，可以帮助消费者理性防范。而新食品安全法则更加明确了企业、政府以及消费者的责任，使大家能够各司其职。

第二，企业、政府以及消费者之间应进行风险交流，食品安全云平台则可以加强三者之间的风险交流。现如今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信息基本上来自媒体，而媒体的报道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整个食品安全问题。如果能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交流，中国食品也不会在国际上谈虎色变。

第三，加强分析检测能力。食品问题并不是现今才出现的问题，只是以前受限于分析检测能力，很多问题并未被发现。从最原始的肉眼观察，到后来的显微镜观察，再到现如今的基因技术，我们的分析检查手段在不断进步，检测水平的精度也在不断提高。基因技术已经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某些专业领域的风险因子，企业可以在加工过程中针对这些风险因子进行预防。科技并没有使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相反，科技使我们对于食品安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四，进行全产业链过程管理，对过程进行监控以及管理。如果可以

在全国范围内联动，则能形成从农田到餐桌，从源头到终端消费者的真正全产业链的过程管理。另外，过程管理应建立在良好且有效率的分析检测基础上，不能由于分析检测而造成供应商货品的滞留。

最后，作为企业，我们非常愿意在政府的领导下，以服务终端的市场消费者为目标，共同来承担食品安全的责任，让所有的消费者享受安全的食品。

撰稿：姜元荣(丰益上海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编辑：邓梦佳

二、开启食品云建设，探索食品安全共治模式

（一）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

1、**食品安全的社会问题所涉及的主要主体。**首先需要研究在这些涉及的主体上各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从食品安全的企业来讲，如何使得企业从以价格竞争为最主要价值的市场竞争，转化为以品质竞争为主要价值的市场竞争，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2、**如何有效进行政府的管理。**政府管理涉及面广、监管任务多，其如何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更有效地进行管理，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3、**如何使消费者了解食品安全。**消费者在消费食品的时候，如果能更多地获知食品安全的信息，明明白白地消费食品，那么通过消费购买这样一个市场行为，就能形成一个市场的运行机制，从而促使企业形成一个品质为优的竞争环境。因而我们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使

消费者更多地了解食品安全。同时一旦发生事故，如何将科学知识传播给消费者也是我们要去研究的。很多食品事件发生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知识是有限的，如何去把这些知识迅速地传播到每一个消费者身上，这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

（二）食品云的设计宗旨与目标

食品云的设计宗旨是以数据为基，质量为本，建设可追溯的顶层设计。其中核心就是我们要建设的云平台。云平台主要连接政府、企业、消费者和所有产生检测数据的检测机构或者企业。这个云平台的设计目标就是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型统一高效。这个设计除了要连接社会主体以外，还要使得整个框架实现一个省、市、县的三级架构，形成区域的覆盖，这也是云平台设计的基本理念。

食品云的建设在设计中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1、一定要解决政府的有效监管；
- 2、要给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以品质为导向的市场竞争的环境；

- 3、要在政府企业之间，使云平台起到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云平台要把这几个主体有机地联系，通过信息的交流，实现例如说，当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发生以后，我们可以迅速通过云数据所提供的科学知识为基础，进行一个风险交流，从而引导食品企业实现以品质为优，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健康发展。

食品安全云建设工程是 2004 年贵州省确定的重点工程，现已成为贵州大数据信息产业的一个引领和示范工程。这个云工程主要是以云计算和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支撑，结合食品安全问题的需求，建成

了今天的食品云。食品云的建设目标是，至2017年要建成国内领先的测试信息系统、支持系统和监管系统，以及与移动互联网终端有机结合的这样一个平台。现在我们已经率先建设中，至2017年要成为领先建设平台。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主要的建设方向如下：

1、食品安全信息的集聚。我们要在贵州省打造一个骨干数据的结合，同时形成一个有全国一万五千家企业进入的平台。

2、信息管理平台系列产品。在云平台这样一个信息管理平台以下，我们要开展一系列的产品，包括有测试系统的管理系统，有我们独立知识产权的知识管理系统，还要组建一个由国家权威专家领衔的食品安全支撑系统，同时我们还要将政府管理的食品安全问题有机地在云平台下建设完成，最后我们要形成一个有五千万以上的移动终端用户的门户。

3、信息服务产业。我们最后一定会形成一个信息服务的产业，然后还要带动相关食品企业的信息服务。

（三）食品云的系统开发

食品安全云工程得到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省长多次批示，省政府多次召开专题的会议来推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高度地认可食品安全云这样一工程，并且还给了许多支持。食品安全云，在技术上首先是用了现在最先进的平台架构技术，同时我们用独立的知识产权与技术开发了食品测试的管理系统，这个系统目前已经有18个著作权得到批准。我们用云技术、云运算以及大量的成熟数据作为技术支撑，同时用国家工信委认可的底层技术安全来保证我们数据的司法可靠性。我们利用大学、美国专业的公司、以及大量信息挖掘技术，来

开发数据挖掘应用后为企业服务的产品和为老百姓服务的产品。

目前总共为云平台做了三个系统的开发：

1、食品安全营养知识系统。这个系统就是要解决社会共治中社会风险的交流，就是要向社会大众传播食品的科学知识，这在社会管理的传播途径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它也是为很多专业的机构提供科学方法的的一个有效工具，包括食品安全按标准等法律法规，都会在其中体现。

2、食品营养测试系统。这个系统要解决所有数据采集的标准化、信息化，它要在云端下，完成全国各地甚至整个世界检测同盟者之间的价值链。

3、解决食品安全监管的信息管理系统。这个系统主要解决政府的有效管理，要在政府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更精确、准确的进行有效的监管。

在三个系统的基础上我们还建设了两个终端：

1、互联网的终端。通过我们互联网的网站，可以和所有的大众面对面交流。

2、手机移动终端。也就是直接对每一个食品，消费者都可以进行一个迅速的查询，消费者想要了解食品只要在手机上简单查询即可。我们目前已经总结一些规律，加入了上千万条的信息，涉及食品两万多个，并且仍在不断添加中。

关于上述系统也已经有一个示范推行，我们已经在一千多家企业里面，由企业直接建立一个面对面的应用，其他我们还在一些规模超市进行一些数据采集与应用。同时我们在省外的检测联盟机构里面也已经开始推行应用。整个应用说起来非常简单，我们每一个食品样品

的检测速度、数据采集一定要按照国家的标准、法律规定的流程来完成的，然后通过终端、网站进行收集，最终实现可以在线上进行交流。同时在线下，该应用在商场也可以进行交流，手机会把相关的食品信息都会告诉我们。这些数据有一个不断的完善和覆盖的过程。对于企业，每一个企业在云端都有门户，他通过一个门户就可以和我们的食品检测做交流。对于监管人员，又有一个专门的移动终端的应用，其在平常就可以随机查找，或检查市场的主体是否按照国家法律的要求，从而完成他的义务和责任。还可以让所有的从业人员轻松地通过线上学习，了解有关食品安全的知识。对于电商，例如京东的食品如果通过云平台，马上就可以看到产品质量的情况，这完全是通过一个数据传递和信息连接完成的，在国内尚属首例。

（四）食品云的其他建设问题

1、**产业载体。**食品云工程是按照我们省政府的要求而做成的一个信息化服务产业，产业载体由中国广州检测分析研究院、北京的营养研究所等联合组建。同时我们还联合了北京大学和省局的一些工程中心，对数据挖掘、服务技术等形成一些载体。

2、**人才问题。**我们聘请了由国家院士领衔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的产业载体也吸引了在美国、英国、荷兰、瑞典等等一些大企业工作过的人才。食品安全云的流程中，比如说56个食品的分类里面，每一个分类我们都会相应地安排团队中的专家。整个食品安全云工程还和许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了合作建设，同时也和许多其他产业进行合作，如京东集团、茅台集团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建设集聚的力量。

3、资金。食品云得到了政府一些项目支持。另外我们在半年内以八倍市值的额度得到了风险投资的资金投入。我们还和一些企业申报了国家的一些项目。在示范应用中也集聚了一些有品质的企业。

4、新闻媒体。整个食品云的建设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都做了不同角度的一些报道。

5、国家层面支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表示要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排的食品检测任务中的一些数据传给我们的食品安全局，支持我们建设更大，更高，为全国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国家科技部积极支持我们成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且把我们纳入国家科技部在做的国家食品安全创新工程的范畴之内。国家认监委也积极支持我们这个食品检测体系。国家工信委已经把贵州互联网融合国家创新的试点单位列入其试点单位之一。2005年国家工信委首个批准大数据产业的集聚区也在贵州落户。

食品安全云，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体的连接形成一个良好的产业的食品竞争的环境，在社会消费者、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一个科学的风险交流的平台，让所有消费者明明白白去消费，安安全全去消费，踏踏实实去消费，促进整个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最终我们将形成新兴的信息大数据产业，成为服务产业一个新的延伸，打造一个政府监管、企业自律、消费者通过购买行为真正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模式，形成动员所有社会主体的对社会食品安全的共同治理。

撰稿：陈亦康(贵州科学院)

编辑：沈轶敏

三、建设碳排放贸易系统，承担节能减排责任

2013 年是中国碳市场的一个新纪元年、开创之年，中国于该年开始启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在 2016-2017 年落成的 ETS 系统，项目将会从一个试点推广到全国范围之内。

（一）中国 ETS 系统建设情况

1、全球碳排放贸易体系情况

在 2012 年之前，碳排放贸易体制仍以 UTES、欧盟或是新西兰为主，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入其中，目前约有四个洲的 35 个国家以及 7 个城市参与到碳排放贸易体系。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大约占 GDP 的 15%，人口的 48%，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人生活在碳排放贸易体系中。

2、中国项目试点情况

第一，项目覆盖区域。中国于 2011 年开始共设定了 7 个试点项目，项目覆盖城市包括上海、北京、深圳一类 GDP 占比大，工业体系发达的经济发达城市，也包括湖北、重庆等经济发展弱于一线城市的地区。通过这七个排放交易体系的试点项目，中国希望能够探索一条将系统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的路径。

第二，各试点项目差异化规则体系。这七个试点项目于 2013 年-2014 年之间一一启动，并且各自建立了自己的规则，包括覆盖率、分配、数据收集、法规工作等，因此各试点均各自有自己的特点。

例如，因为这些不同的城市和省份有着各自不同的城市发展特点，每个试点项目因此设有不同的**二氧化碳排放最高限度**。就这七个试点

而言，目前共覆盖了大概 10 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尚低于欧洲排放体系的数量，但未来中国的 ETS 系统规模将会超过欧洲的交易体系。许多高排放量的，如电力、钢铁等行业都包含在我们七个贸易体系的试点项目之中，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碳交易市场。

又例如，经过两年的运行，大多数的试点项目都有了自己的项目定价，其中定价最高的是深圳，其峰值为 113 元，最低为 20 元。这个定价上的差别是因为不同的试点项目有着不同的最高排放量以及不同的评估方法。且项目定价也有时间波动。

(二)中国 ETS 系统建设经验

在约两年的运行之后，中国碳排放贸易体系建设从试点项目中获得了很多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已经逐渐准备好开展国家范围内的排放交易体系，而这些试点项目为制定未来全国范围内的制度框架提供了诸多帮助。这些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排放交易体制在中国必要性。在过去，中国仅通过需求控制手段来进行减排，比如说减少供应控制手段，但政府须为这些关闭的工厂付出很大程度的代价。而现在在排放交易体制当中，只要对这些企业实施一个限额和一个分配，就可以在企业间进行市场交易。

第二，每一个试点项目都需要非常复杂和完善的政策框架和法律框架。目前有一些已经通过了人代会的批准的法律规定，对于那些非合规行为处以很高的罚金。也有一些实现了国家政府层面批准的法则

第三，项目的实用流程也需要同步建立。在 2007 年之前，并没有一个基于企业层面的排放数字，企业也没有能力收集自己的碳排放数据，其中包括计算方法及汇报途径上的困难。因此在试点项目之中，需要使得企业学会计算自身的碳排放量，并建立对不同行业不同的

MRV 标准。

第四，政府与行业之间需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在过去两年之中两者之间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碳排放交易体系在中国是新生事物，中国政府在逐步学习如何设计政策，而企业也在学习如何适应政策，所以政府与行业之间的沟通交流必不可少，尤其是在**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在技术层面，政府与企业需合作设计一个监测和报告的指南，并进行碳排放的分配。对于企业来说，需要政府去聆听企业的心声，并且知道他们的分配需求以及反馈。行业 and 企业的碳管理建设在过去阶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过去行业和企业仅知道提升能效，而不知道如何进行碳管理与碳交易，过去三年，大多数的企业已经集中一个公司邀请专业人员进行碳管理并设计了一些相关规定。企业从合规到逐渐适应，并逐步控制长期风险，并且和政府进行了明确的沟通。

第五，建立透明的市场和不断进行产品更新。碳排放交易市场是一个市场交易过程，一旦建立政策，就像其他的商品一样产生市场效益。因此在过去的 1-2 年里，就有很多金融交易参与到碳交易市场，比如碳基金。对此未来可以进一步进行二级市场的交易，或者利用碳额度作为银行贷款的一种信用担保。

(三)有关全国范围内碳排放系统建设的政策建议

第一，不断扩大每一个试点项目的地理范围，直至融合到全球区域。

第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逐步让非试点地区参与到国家范围内的交易体系之中。

第三，更严格有效的系统规则建设。中国国家范围内的排放交易体系准备工作正在加速进行之中。去年年底，发改委发布了一个有关

排放交易的崭新的临时条例。根据这个规则，中国将会建成一个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国家层面交易市场，将会由中央政府进行标准化的统一工作，同时将会对现在的暂行条例进行进一步的更新，建立更严格的合规。在这个由发改委制订的规则之上，我们还需要把制定权利进一步交给国务院，对违规企业进行更严格有效的惩罚，建立更有效的交易体制。

第四，国家范围内交易体制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有以下的任务需要完成：

(1) CCER 规则，包括保险和贸易规则。在 2012 年，发改委已经发布了一个 CCER 的法规规则。两年之后，中国开始对 CCER 进行贸易，它将对七个试点项目进行一种补偿，另外有一个统一的市场指南将被发布。

(2) 全国范围内对于未来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统一标准及全国注册制度。未来针对碳排放，将会有有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配额制定和分配。去年中国发改委已要求省级单位对二氧化碳气体排放超过 1300 吨的主要企业进行数据汇报，从而建立国家范围内的交易体制。

国家范围内统一的碳交易体制规则包括两层的管理体系，首先是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规则制定，包括系统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排放限额等；其次是省级政府，主要负责规定的执行，以及主体单位排放量的决定。省级层面同时需要一定的灵活度，例如如果项目需要覆盖更多的行业以及企业的话，就应建立更为严格的配额分配规则，可以根据国家层面的规则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同时还可建立一些合规性的规则。如果企业拒绝汇报排放信息或者是拒绝按照排放信息来进行缴费，就可按照规则进行大幅罚款。

撰稿：李瑾(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编辑：沈轶敏

四、积极应对老龄化

全球公募养老金的改革，始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起因是经济困难引起的财政危机。各国不仅考虑到了财政的困难，也把人口老龄化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开始深刻地反思公募基金制度的职能定位。目前，大多数国家已经基本完成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中国大陆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改革的探索，到 1997 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标志性制度，正式公布实施。当时国内正在经历经济体制的改革，虽然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考虑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但是从制度设计到实际运行，还是存在不少问题。

（一）养老保险制度设计须考虑两大因素

人口老龄化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有重要影响的。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都有 2 个关键点需要注意。

1、在养老金计发办法和筹资方法确定的情况下，基金状况跟参保人群的年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由于退休人员所领的养老金主要是来自于在职人员的缴费，缴费的在职人群和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群，这两者的比例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2、寿命延长会导致基金的支付增加。

目前中国大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三个，第一个制度是针对机关事业单位的，也就是公职人员的退休金制度。这个制度最近正在改革，

正在跟企业的退休金制度并轨。实际上二者并不会完全并轨，至少资金不准备放在一起，只是机关事业单位制度上准备向企业制度靠近。但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有一个水平很高的职业年金，所以我很担心那个时候的用人单位的负担和财政的负担都会过于沉重。

第二个制度是针对企业为主体的，就是城镇的非公职人员参加的制度，通常叫职工基本养老制度，也叫企业基本养老制度。尽管这个制度目前在中国所惠及的人数不是最多的，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性，它从1997年开始实施，2005年修改过一次，现行制度基本框架还是没有变过。这个制度的设计，无论是1997年的制度，还是2005年改革后的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

第三个制度是针对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制度是主要是针对没有固定工作的，或者没有工作单位的农民和城镇居民的。这个制度是保障水平比较低的一个制度。

（二）现有养老金制度存在问题

1、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从投资机制看，欧洲国家的传统是以现收现付制为主要形式的，后来新加坡用的是完全积累制，智利用的是积累制，与新加坡不同的是，它不是由中央集中管理，而是由各个保险公司分开管理的。当时的制度设计者考虑到老龄化这个因素，决定要做一个个人帐户，这个思想来自于新加坡，同时又继承欧洲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度，因此我们采用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基金两者结合的方法。但是事实上，这两个资金并没有完全分开，而是联通的，当统筹基金不够用的时候，就开始挪用个人帐户的基金，当个人帐户基金不够的时候，就会去挪用统筹基金的钱，二者不分开。从最近

17年的实践看，个人帐户根本没有做实过，也就是说本来想通过积累制来应对人口老龄化，但是事实上积累不了，而且把这两者加在一起，只有少数地区资金有结余，所以要通过积累来应对老龄化。

2、养老金领取年龄的问题。是否要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现在总算是准备做一个逐步提高的、渐进式的退休年龄提高的方法，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方案。退休年龄跟这个基金的关系非常密切。就是因为退休年龄低，缴费人群就相对的少，有人统计全国男女合在一起，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事实上我们现在预期寿命已经提高得很快了。

3、养老金计发系数的问题。这是指个人帐户的计发月数，这个数字我们原先设置的是120/1，最近提到60岁的男性是139，专门有一张表，60岁的男性139是比较典型的，但是事实上按照现在的投资回报率，或者现在能够预期的预期寿命，这个数字也是不够的，而且如果投入回报率低的话，差得更远，因此这这也是一个问题。

4、养老金待遇调整的问题。也就是要考虑确定养老金水平的因素：第一，退休的时候你可以拿多少养老金，这是在计发办法里面决定的；第二，以后按照什么规律增长，这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很多地方退休人员拿的收入，要比在职的工作人员拿的还多，形成倒挂的现象；第三，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

（三）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1、回归保基本，长期精算平衡，实现养老金可持续运行。有些人认为给老年人养老金多一点是好事情，但是要注意到，第一，现在养老金拿得多，未来的老年人能不能拿到那么多，这是个代际均衡的

问题，第二，现代养老金是从哪里来的？从本质上来说，是来自现在在职的人，他们供的快，所以我们发现在现在的老年人跟现在的年轻人之间，实际上利益是不均衡的。此外，现代老年人跟未来老年人也是不均衡的，养老金多发一点，企业负担就会重很多，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企业有两个“第一”，第一是税收负担第一，第二是社会保险费的负担也是第一。

2、改善制度结构，实行统账分离，分别建立基金长期平衡机制。

3、改变计发办法，把寿命延长这个因素植入养老金机制，鼓励养老金推迟领取。特别要说一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计发办法，特别是2005年国务院38号文件所规定的养老金计发办法，很多人还是希望少缴费、希望缩短缴费的时间，实际上这是因为不了解这个制度，真正了解这个制度的人，会很积极地参保。因为长缴是有好处的，这个我们仔细算过账，所以要鼓励推迟领取，但是计发办法还可以再改进。

4、以CPI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完善待遇调整机制，现在的调整幅度太大，也就是涨得太快了，建议以CPI为主要考虑因素，兼顾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完善待遇调整机制。

撰稿：何文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编辑：焦露曦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复旦发展研究院

地址：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东主楼 7 楼
网址：<http://fdi.fudan.edu.cn>